

## ※ 研究動態 ※

# 千里尋跡安徽行 ——乾嘉學術研究赴大陸考察報告

楊晉龍\*

二〇〇〇年二月十一日（星期五）

1. 本來大家約定早上十點左右在文哲所大門上車，前往桃園中正機場，由於未見鍾彩鈞主任，又無法連絡上，因此大家非常擔心，以為有什麼臨時狀況，最後不得已纔上車趕路，沒想到一進中正機場，就發現彩鈞已經比我們先一步到達，原來他家附近就有直達中正機場的車子，所以就自行前往，因為沒有聯絡好，害得大家白擔心一場，死了不少細胞。
2. 搭乘國泰 CX-421 班機，於中午十二點十分起飛前往香港；然後與朱榮貴會合，一起轉搭中國民航 MU-5014 班機，於下午四點十分飛往安徽合肥，約於六點十分左右到達。陳友冰教授早已經在合肥機場等候多時，經由陳教授的熱心安排，很快就出關，搭乘中型巴士前往位於合肥市蕪湖路上的「金安徽國際大酒店」休息。住宿安排：鍾彩鈞與林慶彰先生、張壽安與陳淑誼、蔣秋華與楊晉龍等人住雙人房；朱榮貴住單人套房；作息時間：早上七點起床、七點半用餐、八點左右出發，以後住宿和作息大約均如此安排。
3. 由於大陸還在過春節假期，必須等到元宵節以後才會正式恢復正常上班，因此許多餐廳還未開張，經由陳友冰教授安排用餐。餐中陳教授告知前幾天合肥下雪結冰，路面非常滑，以致僅合肥省立醫院一處，就有五百多位跌倒骨折的病例，其中還包括一位本來約好與我們見面的學者。他還擔心天氣如果不放暖，恐怕飛機也無法降落，我們這次的考察大概就要延後了，還好天氣果然暖和起來，在大陸

---

\* 本所助研究員。

期間平地氣溫大約維持在 1°C 到 8°C 之間，雖然碰到不少下雨天，增加了不少困難，但考察行程並沒有受到嚴重影響。

4. 飯後上街買水果，發現一種像臺灣「巨峰葡萄」的水果，可是店家說那不是「葡萄」，而是美國進口的「梯子」（聲音），問當地人為什麼叫做「梯子」？字又如何寫？直到此次離開大陸為止，還是未曾獲得任何有效的答案，大約要找語言學家纔有辦法解決吧！

## 二月十二日（星期六）上午

1. 經由陳友冰教授的安排，租了一輛中型巴士（駕駛：王師傅），由陳友冰教授與施立業教授和陳教授秘書小朱（朱索先生）陪同，前往「安徽省博物館」（以下簡稱「省博」）參觀訪問。先與博物館的研究及行政人員座談，「省博」出席的有：鄧朝源館長、黃秀英副館長、及研究人員鄭龍亭、董伯信、李暉等學者專家，雙方各自介紹自己單位研究的方向與重點。鄧館長說：「省博」是在一九五三年籌備，一九五六年建成，收藏的文物成品有二十多萬件，有關收藏品的內容情形，以工作年資較長的黃秀英副館長最清楚。「省博」是一座大型地方性的綜合性博物館，收藏品主要是與安徽本地相關的歷史文物與考古出土的資料，包括吳、越、蔡、楚等先秦銅器；徽墨、宣紙、宣筆、歙硯等文房四寶；以及楚國貨幣、漢畫像石、新安書畫、徽州雕刻、徽派版畫、蕪湖鐵畫、徽州契約文書、明清古籍善本、及女畫家潘玉良（1895-1977）的遺作等；另外還收藏有古生物化石、上古石器、玉器、陶瓷、漆器、錢幣、碑刻、法帖、印章、刺繡等。經常性的基本陳列有三：「安徽古代文明」、「古生物」、「潘玉良作品」。根據一九九七年的統計，在大陸一千多所博物館中，「省博」的收藏及重要性排名第六位，始建時曾為全大陸四個標準館之一，現在正在籌建新館，以便更好的保存文物，「省博」設定的五項職能是：收藏、保護、展覽、研究、服務。文物曾出借給臺北省立博物館和日、美等國的博物館展出。館內專家學者中，副教授級以上的有三十四位，在職的十六位、退休有十八位。

2. 鄧館長回答林慶彰先生有關出土文物收藏情形時說：陳列品中有關中國古代文明的文物有一千多件，至於「雙古堆」出土的文物則還保存在「阜陽博物館」，並未藏在「省博」，因此有關這批出土文物整理的詳細情形，韓自強教授應該比較清楚。

3. 副研究員鄭龍亭先生報告有關安徽人類起源考古的情況說：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在安徽和縣陶店鄉龍潭洞發現古代猿人化石（約二十至三十萬年前）、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年在巢縣銀屏山發現智人化石（屬中更新世）、一九八七年在皖南小陽江發現舊石器時代遺址<sup>①</sup>，證明在遠古時代（約二〇〇萬至三〇〇萬年前）長江下游地區已有人類活動<sup>②</sup>。早期西方考古學者的意見，多以為人類起源於非洲，不過由於後來亞洲地區古人類化石的不斷出土，現在則多游移於亞、非之間，中國學者則以為非洲是否真的是人類最原始的起源地，還有值得商榷之餘地。根據一般的瞭解，人類大約起源於二百萬至三百萬年前，安徽地區發現有二百萬年前古人的遺址，並且出土了原始人的工具，所以一九九八年中國「找尋人類起源」的國家大型研究計劃，就將安徽地區與雲南地區、三峽地區同列為重要的考古研究重點地區之一<sup>③</sup>。裴文中先生曾有「江淮過渡區」的說法，因為在二百萬

- ① 晉龍案：不知是否即 1987 年在廣德縣獨立鄉吳家灣發現的舊石器時代中期至晚期的洞穴遺址？
- ② 晉龍案：1987 年和 1988 年在安徽含山縣銅城閘鎮凌家灘村曾挖掘出一個距今約五千多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聚落的遺址。另外還有在安徽潛山縣河鎮鄉薛家崗出土的距今約五千年左右人類文化遺址；宿松縣程嶺鄉黃鱗嘴和望江縣汪洋廟兩處出土的文化遺址年代相當。大陸至今（2000 年以前），已發現六千多處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遺址，且大都集中在華南地區，其中位於河北太行山麓的磁山文化大約為八千年前之遺址、1997 年發現的河北徐水南莊頭村的遺址則是一萬年以前新石器時代的文化。
- ③ 晉龍案：依照一般人類學家的意見，人類來源的形成過程有兩種說法，一是：原上猿、埃及古猿【約 3000 萬年前】→臘瑪古猿【約 800 萬—1400 萬年前】→南方古猿【約 400 萬年前】→直立人【約 50 萬—200 萬年前】→古人【智人，約 20 萬—30 萬年前】→新人【約 3 萬 5 千—10 萬年前】→現代人【約在 3 萬 5 千年前出現】；或是：原上猿、埃及古猿→經過數百萬年→南方古猿【約 400 萬—100 萬年前】→早期猿人【或稱直立人，約 300 萬—200 萬或 150 萬年前】→晚期猿人【約 200 萬年前或約 150 萬至 20—15 萬年前】→早期智人【約 20 萬—15 萬年前】→晚期智人【約 5—4 萬年前】→現代人。中國則發現有：約 4000 萬—4500 萬年前左右的江蘇溧陽和山西垣曲的曙猿化石、800 萬年前的雲南開遠森林古猿化石和祿豐古猿化石、400 萬年前的雲南元謀古猿化石、廣西柳城等發現的巨猿化石、四川重慶和湖北建始出土的巨猿化石、170 萬年前的雲南元謀古人類化石與石器、90—80 萬年前的湖北鄭縣人化石與遺址、80—75 萬年前的陝西藍田直立人、50—40 萬年前的北京人、28 萬年前的遼寧營口縣金牛山人、20—18 萬年前的安徽和縣直立人、18 萬年前的陝西大荔人、18—13 萬年前的貴州銅梓人等等；以及一些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的遺址等等，這些化石和遺址似乎可以說明在中國本土經歷了整個從「猿、猿人、古人、現代人」的完整的演化進程，因而纔有此一計劃，希望能瞭解中國人的來源、和人類起源的相關之疑問。若根據曙猿化石的出現，則中國華北有可能是人類起源的最初發生地之一。

到三百萬年前第一次冰河期時，動物向南方移動，也就是說江淮地區自第四紀的「早更新世」以來<sup>④</sup>，由於氣候條件和特殊的地理環境，始終是中國南、北之間的一條自然通道，因此也就成爲南、北動物的交會地帶，安徽出土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和古人類化石，代表了人類由猿人到新人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也說明安徽是遠古人類活動的地域之一，甚至南、北的古人類，更可能通過安徽這一個「過渡區」，進行文化交流；當然這也表示安徽地區上古文化同時受到黃河下游地區文化、和長江以南的文化之影響；且由於「過渡區」形成的時間頗長，對於古人類的活動，應該有一定的影響，安徽地區在考古學上的重要性，就因位於南、北文化交流的中介地區，溝通了中國南、北不同系文化之間的聯繫，並且和人類的起源也有一定的關係。

4. 副研究員黃秀英副館長答覆林慶彰先生之問，曰：安徽省社會科學聯合會正在編輯《徽學叢書》，收錄二十冊不同主題的書，預計二千年開始陸續出版。再則「省博」收藏的書稿有十幾萬冊，除徽商的資料及醫學書籍外，還包括方以智（1611-1671）、戴震（1723-1777）、程瑤田（1725-1814）、劉大櫟（1698-1779）等一些未曾出版的手稿，例如方以智有關《易經》的著作、未收入兩套《戴震全集》的戴震手稿等。這些資料大多在一九五〇年代徵集安徽地方私人藏書之際所獲得。
5. 雙方表達進一步合作的意願，文哲所向「省博」提出合作點校未出版手稿的建議，「省博」以爲可行，可以更進一步商談合作的細節。「省博」並贈送每位出席座談的學者一本該館編輯、黃山書社出版的《安徽省博物館四十年論文選集：1956-1996》。

④ 晉龍案：據古生物學界的意見，地球歷史可分爲五代：太古代【無生命存在】、元古代【約60000萬—180000萬年以前，可能有菌藻類植物】、古生代【約22500萬—60000萬年以前】、中生代【約7000萬—22500萬年以前】、新生代【分第三、第四兩紀：第三紀，約200萬—7000萬年以前、第四紀『或另稱：靈生代』，約1萬—200萬年以前。第四紀又分：早更新世『約60萬—200萬年前』、中更新世『約15萬—60萬年前』、晚更新世『約1萬—15萬年前』】。人類的遠祖大約出現在第三紀末或第四紀初，第四紀時出現冰川，有冰川存在時稱「冰川期」；兩次冰川中間的時期稱「間川期」，「間川期」氣候溫暖，適合人類生存。約1萬2千—300萬年前爲「舊石器時代」、約1萬2千—4千年前爲「新石器時代」。

6. 接著參觀「省博」的陳列文物，個人比較注意的有：漢代石羊、和縣猿人、巢縣銀山智人、皖南小陽江舊石器遺址、古代陶製兒童玩具：陶球（潛山縣薛家崗出土，約五千年前）、十三孔石刀（他處出土者皆偶數）、蚌埠雙墩定遠侯家寨出土陶器陶文（約七千年前）、西周青銅器、群舒出土青銅器、一九五九年黃山屯溪出土春秋末青銅器（有特殊的編織紋）、作用不明的中空雲紋五柱器、青陽縣九華山下出土的龍耳尊、蔡侯墓（淮南壽縣出土，蔡國銅器多有銘文）、楚王禽肯鼎（475B.C.-221B.C.，有銘文）、淮北褚蘭二號墓東漢畫像石（建寧四年，171）、繪有類似後代「秘戲圖」的東漢墓磚、繪有漢代行禮圖的墓磚等。
7. 正好遇上安徽有線電視臺訪問，乃告知訪問者，以為「省博」收藏文物之豐富，不下於國家級的博物館，尤其所保存的學者之手稿，頗具特色與研究之價值，惜未能好好宣傳與運用，以致知道的人不多，有如明珠暗藏，擁抱黃金而不知如何投資。因此建議他們要有計劃的加以宣傳，讓外人知道「省博」收藏有哪些具有特色的文物？這些文物的價值何在？也就是要有「好東西要讓有興趣的朋友知道」的積極心理，鼓勵學者專家向國外或臺灣發表研究成果，或發表介紹性的文章，甚至與其他有興趣的單位（包括國內與國外）合作研究，以發揮收藏品的最大效益，爭取更多的經費，尤其地方政府應該學習臺灣的做法，真正落實重視地區文化研究，即使無法像臺灣一樣在各縣市設置「文化中心」，至少也該編列預算鼓勵研究，不能讓鄉土的研究自生自滅，因為這種研究有助於愛護本鄉本土教育目標的達成。換言之；就是要有「宣傳」和「鼓勵」的認知。然不知他們聽後的反應如何也！

## 二月十二日（星期六）中午

1. 由陳友冰、施立業兩位教授陪同，前往黃山書社選購相關圖書資料，副總編輯趙國華先生接待，因為還在年假中，僅能就書單之書選購，大家為圖書館及經學研究室和自己選購了一批書，由小朱帶蔣秋華與陳淑誼到郵局交寄。
2. 午餐在頗具特色的「毛家飯店」用餐，服務人員的訓練不足。結帳後，送給每位就餐者一個鑲有毛澤東相片的胸章。

## 二月十二日（星期六）下午

1. 前往安徽省社會科學院訪問座談，出席的有汪石滿院長、唐先田副院長、歷史所朱玉龍所長（小朱的父親）、歷史所施立業副所長、文學所陳友冰所長、哲學所王利耀所長、及余秉頤教授、夏明釗教授、徐天祥教授等人。汪院長首先介紹該院之概況：全院有十一個研究所，一百一十多位研究人員，副研究員以上的有近六十位，各所研究人員編制不一，多則十多位，少則兩位（如一九八三年設立的人物所）。研究的重心是有關安徽的經濟、社會、歷史、文化等相關的問題，整體研究的評價上，以文史哲較強，出版近十部書；主編《江淮論壇》、《安徽史學》兩種刊物。汪院長認為近代以來在整個中國的學術界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學者中，安徽籍的至少佔了十位以上，可見安徽地區在學術研究上的確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值得加以研究，希望兩岸能夠繼續加強合作研究。汪院長因另有公事先行離開，由唐副院長主持座談，唐副院長也表達雙方互相協助、共同研究的意願，同時也同意補足文哲所《江淮論壇》、《安徽史學》兩種刊物所有缺期的部分，陳友冰教授則贈送每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十年》一部。
2. 歷史所朱所長報告：該所共有十位研究人員，副研究員以上的高級研究員有四位。研究人員個別研究的內容包括有：五代十國時期、晚清文化（施立業先生）、淮夷文化、北洋皖系軍閥、李鴻章（1823-1890）等。共同研究的項目則是「家族史」，朱所長認為中國在魏晉以後，出現許多大家族，由於逃避戰亂災荒的關係，有不少中原的士族大家族往南方遷移，因此在宋代以後，皖南出現了許多非常典型的傳統中國社會式的大家族，例如歙縣的孫氏家族；還有明清皖南的大家族等，均是值得注意的研究對象。此外歷史研究所還負責主編《安徽史學》。
3. 文學所徐天祥先生報告有關「桐城派」研究的情況：一、資料整理方面，已整理的文集、史籍等相關作品有：戴名世（1653-1713）、方苞（1668-1749）、劉大櫆（1698-1779）、姚鼐（1732-1815）、吳汝綸（1840-1903）、姚瑩（1785-1853）等的著作，其中姚瑩的《中復堂全集》雖已整理好，然猶未出版；方苞的《三禮》與《春秋》的作品則還未整理；其他學者也還有一些未整理的著作。二、有關桐城派專門研究的成果，有：《桐城派人物考》、《桐城文派評述》、《桐城派》、《桐城文派》等；另外有戴名世的研究，討論其文學與史

論；再則《江淮論壇》曾主辦過「桐城派討論會」。根據徐先生的統計：一九八六年以前「桐城派」研究的相關論文有二四二篇、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七年有三〇五篇，研究的情形大約可以分成幾個階段：五四運動以後到四〇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時期、改革開放後等，整體的研究特色是：人數多、廣度與深度大。各個不同階段對「桐城派」的評價是：「五四運動以後到四〇年代」主要從政治立場的角度批評，所以多負面評價；「文化大革命前（五〇到六〇年代）」依然站在政治立場發言，因此還是以負面的評價居多，不過也開始整理相關的資料，研究方苞的論文有四十篇、研究姚鼐的有二十篇、研究曾國藩（1811-1872）的也有不少篇，這些可以看出研究的趨向。研究的方式由針對單一的書籍或文章的研究；逐漸發展到整個人的研究；然後又發展到結合時代背景的研究。不過有關「桐城派」產生的背景之資料，比較難以確定和獲得。在研究趨勢上，曾國藩共有一百三十五篇論文，可見研究方向的轉移，不過相關問題研究的空間還是相當大，未研究的議題還是相當多，研究開發的空間也還非常大。「改革開放後」的評價，已經不再固定在政治立場上，由於角度不同，所以評價也由否定走向商榷，例如對「桐城派」文學在創作成績上的肯定，開始注意到桐城古文在中國走向白話文的過程中所起的正面積極的作用。認為桐城古文在白話文運動中起了漸變的作用：桐城文派主張要把文章寫通，必須要有一定的規範，寫出來的文章要求簡略明白，這些觀點非常接近白話文的要求，所以白話文運動的成功，並不是憑空而來，而是經由桐城派先前的努力，最後纔促成白話文的全面改變。另外像林紓（1852-1924）、嚴復（1854-1921）等人介紹西方的文學、文化、思想作品，對「新文化運動」的作用與影響，均是值得探討的問題，但是在這方面的相關研究則明顯的不足，有必要加強研究。

4. 徐先生回答楊晉龍有關錢玄同（1887-1939）謂「桐城派」為「謬種」、以及方苞編的《欽定四書文》之內容，是否可以代表方苞之思想的問題說：錢玄同的評價因為有時代的背景與特定的目的，所以有點「矯枉過正」。《四書文》不能代表方苞的思想，但是那些「評語」則可以視為方苞的思想<sup>⑤</sup>。

---

<sup>⑤</sup> 晉龍案：我的看法不同，那些「評語」還是不能完全看作方苞的思想，因為方氏在下筆時，心中無法排除「代皇帝立言」的考慮。除非另有其他證據，否則還是要看作是「官方的欽定思想」。

5. 哲學所王所長說明該所研究的方向有：中國哲學、歷史哲學、清代哲學、現代新儒家研究、科學社會學、社會經濟學等的研究。王所長個人正在研究有關「收養文化」的問題，也就是研究被收養者文化認同的問題，特別注意留學生或僑居外國者文化認同上的困難<sup>⑥</sup>。又說明編輯《清代哲學》一書的主編王茂先生已經於一九九九年過世；《方以智思想研究》一書的作者蔣國保先生，則已經轉到蘇州大學任教；另外則陶清教授著有《明遺民九大家哲學思想研究》一書。
6. 余秉頤先生說他在八〇年代早期研究「存在哲學」。又說當年因為張岱年、任繼愈到安徽講學，提出安徽學術在經學、哲學上均有值得發掘的課題，因而促成《清代哲學》一書的編輯，最先著手的則是「戴震哲學研究」。余先生以為王茂為《清代哲學》一書寫的〈緒論〉中所說的：「清代思想之回復到原始儒學」；即「『回到原始儒學』，就是清代的『主義』」一語，乃其卓見。又說明由於《清代哲學》僅寫到龔自珍（1791-1841），因此他們又繼續完成了約四十萬字的《晚清哲學》一書，最近即將出版，此書寫作的基本原則是：注意社會變化對思想的影響、以及重要思想人物的思想變化對社會的影響。另外該所研究中國哲學的研究員有三位，研究「現代新儒學」的過程和情形是：一九八七年方克立等提倡研究現代新儒學，所謂現代新儒學在三〇年代開始即已存在，而其後則發展到海外，除對中國本身造成影響外；對世界也造成影響，例如：臺灣、香港、美國、新加坡等，於是首先確定了十位新儒學的代表學者，準備將他們最能體現新儒學思想的文章編在一起，並且出版專輯與系列的專門研究論著，最先做的工作就是資料的蒐集，編成學案型的書籍：《現代新儒家叢書》。其中的方東美（1899-1977）是安徽桐城人，因此由蔣國保編輯成《生命理想與文化類型：方東美儒學論著輯要》一書。另外余先生也認為根據他們研究清代哲學的經驗，前代一些學者說清代沒有義理思想，實際上是一種誤解，他的結論是：清代不能說沒有思想義理的研究。
7. 楊晉龍告知與會學者，張以仁老師認為清代學者是希望透過漢代學者的研究成果，以獲知儒學最原始的意義，所以不能說清代學者沒有義理的追求，換言之；清代的學術不能簡單的稱為「漢學」，應該正名為「超漢學」纔正確。余先生回應說：認為清代哲學沒有義理是一種誤解，清代哲學不是沒有義理，祇是表現的形式不同而已。

⑥ 晉龍案：我以為可以擴大研究不同地區「收養兒童」而引發的「親情認同」相關的問題。



8. 歷史所朱所長說明研究徽州大家族的情況，他說徽州大家族形成的原因，地理條件是其中重要的因素，由於山多交通不變，環境比較閉鎖，遭受戰亂衝擊的機會較少，新遷入者在陌生環境中，依靠家族保護的需要增強，魏晉時期大家族私有的「家兵」，就是保護自己族人的武力，這也是魏晉時期大家族所以能延續存在的原因。宋、元、明時期徽州是「理學」重要的發源地之一，因此理學思想對聚族而居的肯定，對徽州家族鞏固與延續，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唐代以後由於茶葉產銷的需要，「徽商」就已開始出現，到宋代以後，出外經商的人逐漸增多，「徽商」即開始形成。徽州由於地理環境的關係，每當戰亂時就有人為了避亂而遷入，人口反而集中；平時則多往外遷移，但是即使在外地定居，祖籍還是會署「徽州」。這些原因與現象使得徽州的家族能夠長久的保持與延續不斷，同時也因而出現比較完善的家族管理與家族的思想。其實許多署名「徽州」的作者，早已搬離徽州，但是他們還是習慣認同「徽州」這個籍貫，可見徽州人鄉里觀念特別重，這當然與儒家文化有關，所以徽州有「東南小鄒魯」之稱，就像山東人（朱所長是山東籍）一樣，具有濃厚的儒家思想的內涵。
9. 余秉頤先生說明其個人研究的情形云：由於歷史上道家人物多數出自安徽地區（如莊子），因此在安徽地區道家思想的影響較大，但是安徽九華山卻是中國四大佛教聖地之一，供奉「地藏王菩薩」（朝鮮王子），因此他正在研究佛教思想從九華山向外擴散和與民衆生活相結合的實際情形：例如：佛教思想與民俗的關係（宗教世俗化與世俗宗教化）、民俗生活中的宗教色彩如何形成的問題等。
10. 唐先田與徐天祥先生提出「中國何時注意到『人』的問題？」、以及「『人爲萬物之靈』的意思爲何？」等兩個議題，希望大家共同討論<sup>⑦</sup>。當時又討論到中國人何時重視「人權」、脫離「神權」控制的問題？<sup>⑧</sup>

⑦ 晉龍案：此種西方概念下的提問法，事實上早有固定的答案。再則此一問題牽涉的內涵非常複雜，無法在這種場合作立即性的深入討論，因此大家僅能提出現代式的個人私見之表述，無法真正深入的根據歷史文獻，從古人立場提出比較具有實證性而可以讓大家接受的答案。

⑧ 晉龍案：這種提問方式，也是西方概念下的帝國主義式的問法，先設定洋人早已脫離「神權」而進入「人權」；而中國人向來沒有「人權」僅有「神權」的控制。事實上「人權」的概念是近代纔出現的觀念，無論中、西在十八、九世紀以前，注意到「人權」的絕對不會是多數人，進入二十一世紀，即使是自認或被認爲是文明高度開發的社會，在不知不覺中迷信、或因自己的愚蠢受欺，而受「神權」控制者，依然大有人在，祇不過「神」的型態有各種不同的變形而已，人類何曾真正脫離過「神權」的控制！

## 二月十三日（星期日）上午

1. 參觀訪問「安徽省立圖書館」（以下簡稱「省圖」），由該館副館長關華女士與古籍部主任陳女士接待。陳主任報告「省圖」藏書特色及書籍來源云：徽州地區由於注重教育文化，因此藏書家甚多，私人收藏的書籍也多，宋代以後的書較多，主要是徽商的贊助刊刻；另外由於徽州宗族勢力較強，因此家譜、族譜特別多；還有買賣的地契也很多；而安徽地區各個地方的方志也收集的相當齊全。收藏的書籍中，安徽籍的作者有五千多人，著作七千多種，抄本與手稿有二千多種，另有泥活字刻本五部、明代胡刻花版畫也有三部，最早的刻本是元刻本。善本書（清代乾隆以前的刻本、抄本、手稿）有三萬多冊、三千多種，其中一千一百多種屬「國家善本」（刻的少、刻的好、流傳少；具有史料價值、藝術價值）；一般線裝書則有四十萬冊，在整個中國圖書館中藏書的排名居於中間位置。大部分重要的善本書已經由「全國圖書館縮影中心」拍攝成微捲，藏於北京圖書館，可以提供給有需要的讀者。唯還有一些善本書並未收入「全國善本書目」中。「省圖」還有一件最得意的珍藏品，就是江澤民的祖譜，上海圖書館曾經想在新館落成時借去展覽，因為江澤民會來參觀，不過後來僅借給他們複製品，並沒有把原本借給他們，蓋怕一去不返也。
2. 陳主任回答林慶彰先生有關其他單位或出版社在編輯安徽相關學者專輯時，是否曾來文詢問有無收藏相關資料的問題之際，明白表示其他單位在編輯學者專輯，如《戴震全書》、《方以智全書》時，並未行文詢問是否可以提供相關的資料。可見大陸學界合作的協調工作有繼續加強的必要。
3. 參觀書庫和閱覽室，發現書籍的保存條件和閱讀條件都非常差，採閉架式的服務方式，該地氣溫屬冬冷夏熱型（年平均溫 15℃：冬天下雪 0℃以下、夏天約在 30℃左右），書庫和閱覽室均沒有空調設備，無論對書籍之保存或讀者之閱讀，均是一大考驗，尤其在溫度低於 5℃的氣候下，若無暖氣設備，實在無法寫字看書，毋怪館中人員告知，平常來借書閱讀的人非常少，來的也絕大部分是年紀比較大的人，很少有年輕人來看書，圖書的使用率因此甚低，書庫中多數書籍上均可以看到一層厚厚的灰塵，在我看來他們應該有能力利用這裡豐富的藏書條件，開發出一些新的研究成績來，但是當地的學者和圖書館方面，似乎並沒有好

好利用這些豐富資源的計劃，惜哉！「省圖」方面表示正在蓋新館，蓋好後條件較好，可以改善現在的不良條件，希望真的是如此。藏書大部份以安徽籍的作者之著作為主，有許多少見的書籍，如光緒三十年（1904）官書局出版，京師大學堂編的《經學講義》排印本；北京大學出版的黃節（1873-1935）《詩旨纂辭》；民國七年（1918）上海江東茂記書局出版的《詩經白話註解》等。由於發現許多少見或未出版的著作，因此鍾彩鈞和林慶彰先生均表達合作影印出版的意願，「省圖」方面也答應可以進一步討論。

4. 在工作人員參考室又發現一些對「乾嘉學術研究」有幫助的參考書。如：安徽省考古學會編印的《楚史參考資料》、戎毓明主編：《安徽人物大辭典》（北京：團結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一月）、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的《中國西南地區省市圖書館館藏古籍稿本提要》等書。

## 二月十三日（星期日）下午

1. 訪問安徽大學，與黃德寬校長、黃曉明副教授、陶新民教授等會面，黃校長說明安徽大學建校的經過：一九二八年創於安慶市，抗戰初期停辦，一九四六年復校，一九四九年遷至蕪湖，一九五四年建制被取消，一九五六年在合肥重建，一九五八年正式招生，主要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劉文典（1889-1958）與楊亮功（1897-）均曾擔任過校長，在臺灣有「安徽大學旅臺校友會」。學校現有一個分校、十個學院，以文史哲的研究為主，在校生近萬人、研究生近千人，是大陸一千零二十七所大學中，在面向二十一世紀選中的一百所重點大學之一：「二一一工程」建設的大學。現在研究的概況是：哲學研究以道家文化的研究較有成果；中文系在元、明、清的戲曲與小說、古代散文等方面的研究較強；博士班有語法、訓詁、文字學等方面的研究；歷史系偏重在安徽地方史與近代史的研究，沈寂教授對胡適（1891-1962）的研究較有成果；另有徽學研究所研究皖南的文化，學科觸及的層面較廣。
2. 雙方交換出版品，黃校長答應補齊文哲所缺期的《安徽大學學報》。另外也請黃校長代為轉交楊貞德贈送沈寂教授、周鳳五老師贈送何玲瑜教授的禮品。
3. 繼與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成員座談，由中文系陶新民主任主持，參與的學者有：白兆麟、孫以昭、孫以楷、趙華富、楊應芹、陳廣忠、鮑恒、朱萬曙、卞

利、解光宇及陪同我們前往的陳友冰、施立業等十幾位學者專家。

4. 朱萬曙教授報告「徽學研究中心」成立經過與任務云：一九八四年成立「徽學研究所」，由趙華富教授主持。一九九九年六月教育部擬於三年內，在全國高校評選出一百個人文研究基地，首批選中十五個基地作為示範，「徽學研究中心」即是進入首批重點研究的基地之一。這次的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目標是三至五年之內成為學術研究中心，擔負學術交流、人才培養、社會諮詢等的中心，以為科研體制改革的示範單位，其中首要的要求就是成為「學術研究中心」。成員的研究狀況是：小學專家楊應芹教授與張岱年共同主持《戴震全書》的編纂；孫以昭教授係周予同先生（1898-1981）之弟子，主要研究經學；孫以楷教授研究哲學，主要對象為道家文化、朱子學；趙華富教授以研究徽州宗族為主；卞利教授研究明清區域社會經濟史與民俗學；鮑恒教授研究黃生、凌廷堪；解光宇教授研究中國哲學、新安理學。「徽學研究中心」可以接待訪問學者，因此雙方可以建立學者訪問的合作；「中心」將在本年八月召開「國際徽學學術研討會」，歡迎參加；「中心」每年將出版一卷四十萬字左右的《徽學》期刊，也歡迎投稿。
5. 朱萬曙教授答覆楊晉龍有關「徽學」具體內容為何的問題時，指稱：乃是與徽州府一府六縣相關的研究，如：傑出歷史人物、宗族社會、醫學、建築、歷代遺留的文獻、文學藝術、數學等等，範圍非常廣泛。
6. 楊應芹教授報告說：他是在一九九六年九月到出版社工作，專門協助編輯《戴震全書》；事實上編輯《全書》的工作，在一九八九年就已列入出版計劃，一九九〇年開始正式編纂，到一九九七年纔全部完成，供收錄著作三十八種，其中有十二種是首次刊行，全書約二百四十萬字。是由張岱年先生主持，有系統的在全國進行全面性的資料收集工作，根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進行調查，以便找到相關的線索，可以說幾乎已把戴震的資料一網打盡了。例如：《水地記》找到二種抄本，一冊裝的三卷本藏在北京圖書館；五冊裝的六卷本則藏在江蘇省南通市圖書館，本書編入時就以南通本為底本，而校以北圖本及北京大學所藏的手稿殘卷而成。皖派學者從江永（1681-1762）、戴震（1723-1777）、凌廷堪（1755-1809）、及其學生們，乃乾嘉學術的中流砥柱，因此乾嘉之學應以戴震為首。戴震的著作，張岱年先生說自己祇懂得三成，標點甚難，編纂《全書》之際，幾乎已經集中了安徽古文獻專家集體之力纔能完成。同時也發現一些問題，例如《孟子字義疏證》中對朱子非常尊重，從不直呼朱子（1130-1200）之名；《毛

- 詩補傳》多數用朱子的觀點，而其解《詩》的方法，實際上是繼承朱子的方法。從戴震著作中從未直呼朱熹名字的現象，可知戴氏對朱子的尊重，所以戴震反對的是成爲「殺人工具」的「理學」，絕不是全盤否定程朱理學，這可以從他對朱子人格、學術的敬重上得到證明。戴震對爾後學術發展的影響甚大。地域性的學術研究，常常可以補傳統大範圍的歷史研究之不足，安徽地區留存的文獻甚多，可以研究的範圍甚廣，應該可以成爲地域研究的標準，成爲徽學研究的中心。
7. 楊教授回答張壽安有關江永與戴震的關係時說：江永和戴震並沒有師生關係，在江永死後，戴震則爲其整理與刊刻遺稿。
8. 楊教授回答林慶彰先生有關「省博」猶有未收入《戴震全書》的手稿問題時說：戴震的專著均已收入《全書》，非專著的單篇文章則有可能。又說清華大學出版的《戴震全集》第一卷在標點上即有三百多處有問題，他曾爲文提出質疑。楊教授又說曾經計劃研究清代皖派學者的語言文字聲韻之學：江永、戴震及其弟子王念孫（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段玉裁（1735-1815）、孔廣森（1752-1786）、任大椿（1738-1789）等人，因爲乾嘉學術在這方面的成就最大，其中段、王在這一方面的成就與地位應不亞於其師。有關這方面的書大約有一百多部，代表中國宋代以來語言文字聲韻之學的最高水平，可以說是集大成之作。古音學的研究到戴震已相當高，例如《廣韻》二〇六韻的排列、陰陽入三分之發現，成就很高。然因資料太多，如江有誥的《音學十書》，必須花費的人力太大，所以沒有執行。另外江永的學術淵源，可以往上追溯到朱熹，從朱熹往下探討，觀察其由初創到高潮的演變過程，則對其源流發展可以有更清楚的瞭解。「徽學」可以說是代表中國幾百年來傳統文化的最高成就，由戴震開創的「皖派」，傳至江蘇，有俞樾（1821-1906）、章太炎（1869-1936）、黃侃（1886-1935）及其八大弟子、還有臺灣的林尹（1910-1983）、潘重規（1908-）等，皆是「徽學」之後進。徽州何以能夠出現這一大批學者型的人物？主要是徽州的文化根基深厚，這與徽州的移民社會性質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不但將中原的文化傳統輸入，而且還繼續保持下去，這對徽學形成的影響甚爲深遠。清代的乾嘉學者固然多有研究範圍廣泛的特質，但是其中比較具有特色還是徽學，而且一直沒有中斷的流傳到現在：章黃學派即是徽學。現今學術界還有不少是繼承徽學遺產的，可見徽學對現代學術的影響與重要性。
9. 卞利教授說明「徽學」的意義云：「徽學」的範圍廣、內涵大，不僅指戴震一系

而已。「徽學」並不等於「安徽學」，其地域也不是指現在的安徽省全部，而是指明清兩代徽州府治轄區內的六縣：歙縣、休寧、祁門、績溪、黟縣、婺源（今劃入江西省）等地區。「徽學」的地理空間範圍即指上述地區，研究的內涵則是徽州整體的歷史文化。徽州初設於北宋宣和三年（1121），其前身為歙州、再前則為：新安、新都、古歙，徽州在古代是屬山越部族居住的地區，直到三國時代東吳的孫權纔攻滅之，基本上是屬於吳越文化的一部份。所以徽州文化的分段，可以以宣和三年為界，其前屬吳越文化的範疇；其後到民國成立（1912），則可以說是中國封建社會文化的代表，集中反映了中國文化在近代社會發展中的歷史走向。徽州源自歙州、新安，是一個移民的社會，居民大部分是由北方南遷的移民，遷入後與當地居民融合，在平時又向外移民，由於這種移民社會的特性，所以文化的傳承不會侷限於地方文化，因此徽州文化既是地方性的文化；但又不僅僅是地方性的文化而已，所以徽州學者所傳承的也不僅僅是朱熹所創的「新安理學」一家而已。

10. 趙華富教授說明其研究的情況：主要是針對徽州的宗族社會進行田野調查。趙教授認為徽州的居民大都是土族，由中原大舉遷移而來，遷入的時間可以追溯到周朝，遷居到徽州者基本上把中原帶來的傳統承繼下來，尤其是中原地區世族大家的宗法制度，一直在徽州地區流傳延續，成為當地的傳統。
11. 趙華富教授回答安徽社科院施立業教授徽州地區「宗族」是從近代（約從宋代）起纔開始興盛，則其前近千年的時間何以不發達的問題時說：因為比較大規模的移民多數是發生在唐代，多數移民是在唐末進入，宋代移民較少。而一個宗族的形成，至少要落戶後經過一、二百年的時間；甚至要長達三、四百年才能形成。例如有一些是六代單傳，必須是六代同一高祖，纔可以稱之為同一宗族，所以這一家族至少要經過十二代纔形成宗族，因此要遲至宋代纔興盛起來。
12. 趙教授回答張壽安有關《朱子家禮》在徽州被奉行的情形時說：他在〈徽州宗族祠堂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曾談到這個問題<sup>⑨</sup>，徽州人奉《朱子家禮》為聖典，無論《朱子家禮》是否朱子所作，然其指導思想還是「理學」思想，而宋元以後的

<sup>⑨</sup> 晉龍案：見由安徽大學贈送的周紹泉、趙華富主編：《'95 國際徽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7 年 10 月），頁 31。另外趙華富教授贈送《兩驛集》、周中明教授贈《桐城派研究》。

朱子思想，就如同現代共產黨的馬列思想一樣，是主導全民的思想。趙教授又說「宗族」的由來云：「宗族」觀念是從周朝開始確立的，「宗」與「族」不同，「同祖」或「同姓」曰「宗」；「直系之親屬」稱「族」，「宗」與「族」是用來區別親疏遠近關係，徽州「宗族」的形成，根源來自周代，自西周與東漢末年開始，由於戰亂的關係，「世家大族」不斷的南遷，只有「世家大族」纔有需要和能力逃難，一般平民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逃離，由於遷入的多為「世家大族」，因此將中華文化傳入，其中當然包括「宗族制度」，並且多集中在徽州地區，所以「宗族」文化就在徽州迅速發展起來。其現象之一即對「教育」的重視，根據調查在解放前僅永濟村一地即有五十九個大學生、三個留學生，相對於趙教授老家有二百多戶人家，僅有趙教授一人上大學的情形，就可以看出徽州地區之重視教育了，宗族中考取進士、舉人的也經常是一大批。這種重視教育的傳統，是值得保持的好傳統；傳統非常重要，徽州人重視教育傳統的結果是：徽州幾乎沒有「文盲」，所以被稱為「東南鄒魯」，亦即中國傳統的文化中心，已經由山東轉移到徽州來了。

13. 張壽安問戴震提出所謂「以理殺人」說法的緣由。孫以昭教授回答云：他是周予同先生的學生，周先生教他們學中國經學史要「抓兩頭在中間」，所以比較注意兩漢與清代的學術，一九七八年開始研究先秦兩漢的學術，研究的方式是文史哲相結合；接著研究老莊思想，以跨學科的方式研究，結合文學與養生學。孫教授認為戴震能在清代提出「以理殺人」的說法，非常偉大。對乾嘉學術有所謂「吳博皖精」的說法，戴震實兼而有之：「博大精深」，戴氏的學問涉及的層面非常廣，就整體的學術成就而言，後代學者，無人能夠超越他。戴氏所以能夠提出這樣偉大的說法，與他生長在徽州地區有關：一則徽州地區的環境較為封閉，因此留存有許多非常保守的傳統；二則經商者比較多，商業活動發達，容易萌芽資本主義，接觸外界的思想比較容易，思想較為開通，對那些壓制束縛正常人性的習俗，會有所反思而加以批判。因為徽商長期離家在外經商，所以纔特別強調封建家法，當時的封建禮教也特別厲害，戴震提出這個說法不但和整個大文化背景有關；其實也和徽州地區的特殊性相關聯。商業發達而又講求禮教，「徽商」自己在外面花天酒地，卻要求家中的婦女「從一而終」，戴震在這種背景下提出此說的意義在：一則反對統治的宋學；一則抨擊「以理殺人」的不當。翻看《清實錄》就會發現乾隆（1711-1799）、嘉慶（1760-1820）二帝多有廢除「貞節牌

坊」的主張，但最後還是無法廢除。

14. 陶新民教授認為徽州地區對「婦女貞節」的要求特別過分，所以《徽州府志》內收錄記載的烈女、節婦非常多。
15. 白兆麟教授是從安慶移入徽州者，它主要是作語法與訓詁的研究。他則認為戴震會提出「以理殺人」的觀點，不一定與他看到許多徽州婦女守節的現象有關，因為見多了更可能習以為常，不一定會引發反對的意識。白教授解釋徽州宗族文化特別發達的原因說：一則徽州的本地土著非常少，絕大部分多是移民，這些移民把中原的正統文化遷移進來，並且長久的得到保存；再則由於「徽商」的經濟支持，所以徽州的宗族文化纔會一直盛行不衰。文化必須碰撞接觸，纔有可能發展，徽州文化是中原文化與東吳文化接觸碰撞的結果，不但形成徽州本地的文化，而且還能輻射出去，對整個中國文化產生重大的影響。戴震所以能提出「以理殺人」的觀點，白教授以為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互相滲透交融的結果，因為戴氏非常熟悉自然科學，因而養成他善於發現的思想；再則他又深受孟子「人本主義思想」的影響，如果沒有這兩種思想的融合，恐怕戴震即使看到許多不合理的現象，也無法提出這一問題。戴震所以能夠提出這一問題的淵源是：一、外來思想的影響；二、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交叉融合；三、孟子人本主義的影響。至於徽州文化的特點則是：一、「重學」，把教育看的比什麼都重要，孩子一定要唸大學；二、有錢人，首先就是要求讀書、有文化，並且主張要送孩子到外地讀書；三、人文精神濃厚，尤其比較山區的地區，情形更為突顯。
16. 白兆麟教授說屯溪在解放前有二十三個國家的外國人在當地活動，徽州地區的外國人特別多，這些外國人在徽州地區辦學校、辦醫院、蓋教堂、辦教會，白先生就讀的「天山小學」，就是外國人辦的。清代是否也有許多外國人在徽州地區活動？戴震之思想是否有可能受到西洋思想的影響？這當然必須調查戴震當時是否有這種情形才能下判斷。
17. 孫以昭教授說：清代「樸學」的公式是：由小學而通經學；由經學而明道。乾嘉學者中真正「明道」者，僅有戴震和焦循。戴震為學以明道為目的，所以特別重視《孟子字義疏證》一書。
18. 趙華富教授謂戴震的影響主要在外地，對徽州僅有一小點作用。另外胡適、陶行知（1891-1946）也都是徽州人，但他們的影響也都在外地。徽州在近代文化史上有貢獻的人物，在民國編的《歙縣志》中有不少。



19. 白兆麟教授又說：徽州的保守表現在禮俗、習俗上，非常尊重傳統；但在文化思想上則並不保守，容易接受外地的東西，例如：全中國就只有徽州地區纔有「女祠堂」。
20. 卞利教授問說：「女祠」、「貞節牌坊」的建造，是女性主動的要求，還是被動的賜予？應該是男性幫他們提出的。女性遵守「貞節」的要求，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應該可以再加思考。
21. 孫以昭教授回答林慶彰先生問周予同先生的學生之事云：湯志鈞、朱維錚、章權才等人皆是周先生的學生，他和朱先生有聯絡，其他人則沒有聯絡。湯是周先生中年在「無錫國專」的學生，朱先生和孫教授則都是復旦大學五年制的同學，孫教授是五五級的比朱先生晚一年畢業。周先生和湯先生的關係非常密切，周先生不但介紹出版湯先生的著作：《戊戌變法史論》等書，而且也曾為湯先生解決過政治上的一些問題，五十年代末期周先生發表了一系列有關經學史的文章，觀點與材料大概都是周先生的，但是發表時則由周先生與湯先生共同署名。在十年動亂時間，湯先生首先、第一個站出來高喊打倒周予同，甚至在出版的經學史書中也一字不提周先生，好像他的經學史的知識是天生擁有的。朱先生是三十六年生的比較狂妄，眼高於頂，但是非常尊敬周先生，所以看不慣湯先生的作為。客觀的來說；湯先生在經學史上的造詣，應該比朱先生稍微深一點。至於湯先生把他和周先生共同署名的文章收入自己的論文集內，既然是合寫也就沒有所謂「剽竊」的問題，但是應該要加以說明，湯先生一字不提周先生，好像是他一個人的作品，這是不應該的<sup>⑩</sup>。
22. 朱萬曙教授想瞭解本處經學研究的概況，由林慶彰先生報告說明。
23. 孫以楷教授說明自己研究的是有關道家的文化。他說道家思想是淮河流域的文化，他正在探討宋代二程的人性論思想是否受到道家影響的問題、也注意朱子思想與道家的關係，臺灣的陳鼓應教授曾提出道家學術是中國哲學的主幹，不過恐怕不能成立。孫教授又說：宋代的儒學是融合三教思想而成的「新儒學」，相對於原始儒家，宋代的儒學是經過程、朱純化的中國哲學，也就是與政治脫離關係的儒學。又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範疇當然是「道」，但不是陳鼓應強調的「道」，陳鼓應所說的「道」，只是中國傳統「道」之一而已。孫教授認為中國

<sup>⑩</sup> 孫教授特別交代這段說明祇能作私下的意見，千萬不能公開，我們應該尊重孫教授的聲明。

文化可以稱之為「道的文化」，在這意義下的「道」，不但道家有；佛家與儒家也都有。又說明「徽學」的理論根據云：「新安理學」的創始者是朱子，朱子曾有兩次到新安講學，因此在新安有一些弟子，就其對「徽學」的影響言，朱子不如其弟子的影響力大，「新安理學」乃是「徽學」的理論重心，「徽學」的思想離不開程朱理學，程朱理學的「理學」內容，已經把「禮」包含在內，「禮」與「人」相結合纔成為「理」，這就是「理學」的意義。

24. 陳友冰教授問孫以楷教授：四川的卿希泰教授領導的道家文化研究的地位與價值如何？唐宋文學中所表現的道家思想是否比較接近「道教思想」？林慶彰先生接著問：四川大學的道家研究，研究道教的儀式，是否偏向於宗教史的研究，而不是思想史的研究？孫教授回答說：四川方面的道家研究作的比較細，孫教授非常欣賞他們的研究方式，並以為在有關「宗教學」與「道教學」的研究方面，大陸其他地區的研究，沒有一家能超過他們的<sup>①</sup>。至於唐代文學與道教思想的關係，以李白(699-762)為例，應該曾受到道教的影響，因為他和道士吳筠(?-778)的關係密切，道教的宗教理論是否影響到李白的詩歌創作，應該是可以再加仔細探討的問題。

25. 解光宇教授想瞭解本處有關「詞」與「戲曲」研究的情況、以及是否有人研究「詞樂」的問題？由鍾彩鈞回答。

## 二月十四日(星期一)上午

1. 由陳友冰、施立業、徐天祥等三位教授陪同，離開合肥南下往桐城，到桐城后樂園賓館(即舊桐城縣政府招待所)和昨天先來安排的小朱會合，然後與當地「安徽省桐城派研究會」的成員座談，由主任操鵬先生與江小角先生(桐城市博物館副研究館員)負責接待，贈與「桐城派研究會章程」、「桐城派基金會章程」等兩份「徵求意見稿」<sup>②</sup>。
2. 操鵬主任報告說：根據調查桐城派的作家共有二千二百一十二人，留下著作二千

<sup>①</sup> 晉龍案：此一論評大大值得商榷。四川的道家研究，馬列政治思想的影響甚大，其論點頗多政治性而非學術性的判斷語句。

<sup>②</sup> 晉龍案：顯見該研究會並未積極活動。

- 餘種；桐城本地的作家有一百五十多人，在屯溪、桐城各地遺留下非常豐富的歷史文物，如清代姚瑩（1785-1853）的故居，像這樣的明、清名人之故居知道的有三十餘處。桐城的文人大多均從事教育工作，在桐城文人中也有一些流寓在外的人士。桐城人的成就不僅在文學方面，所以除了文人的遺跡外，還有其他的文物、及歷史文化的資源，值得參觀。比較有價值而值得注意的地面文物有四百六十一處（重點文物一百三十五處），但由於維護的情況不佳，能看到的並不多，如宋代畫家李公麟（1049-1100）的「龍眠山莊」僅剩下一片空地。不過最近年來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修護了不少歷史古蹟，例如清代「父子雙宰相」張英（1637-1708）、張廷玉（1672-1755）父子，其中張廷玉在龍眠山的墓，已經修護的非常好，桐城文廟也正在整修中。桐城不但是歷史文化的名城、也是桐城文派的故鄉和發祥地。有關五四時代如錢玄同等對桐城文派的批評，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應該是一種爲了當時歷史的需要，而作的不公平的評價；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曾經召開過一次「桐城派學術討論會」，發表論文七十一篇，參加的學者專家們的評價就比較客觀公平，操主任以爲趙華富教授的研究和評價最爲公平客觀。另外在桐城縣圖書館設有「桐城派文庫」，宗旨之一就是要收集、瞭解世界各地有關桐城派研究的資料與研究的狀況，桐城派的研究不僅屬於桐城地區，早已經是屬於全世界的了，有關桐城學者後人，大多分居世界各地，如方以智（1611-1671）的後代有居留在國外的，也曾經回來祭拜過方以智的墓。
3. 江小角先生報告說：由於時間緊迫，所以能參觀的地方有限，他建議參觀：「桐城文廟」（現爲桐城市博物館）、吳汝綸（1804-1903）半山閣藏書樓、吳越（1878-1905）故居、張英故居、張廷玉墓、姚瑩墓、東大街古建築等。
  4. 操主任又說：桐城人非常重視讀書，有「貧不丟書，富不丟豬」的俗諺，表達再窮也要讓孩子讀書的決心。現在桐城縣圖書館有一萬一千餘冊舊籍，正在編《桐城近代文人傳》、在方以智故居建「方以智紀念館」、預定二〇〇二年建成「桐城派文物陳列館」。已編好出版的有：《桐城縣志》、《桐城文化志》、《桐城文物志》、《桐城古史精華》、《桐城掌故精華》、《古文辭類纂》、《桐城近世名人傳》等。預計出版的《桐城派研究》期刊則還未出版。

## 二月十四日（星期一）下午

1. 一行人由操鵬主任、江小角先生陪同，驅車前往參觀「文廟」、「張廷玉墓」、「姚瑩墓」、「六尺巷」、「桐城中學」（內有半山閣、惜抱軒銀杏樹、二野渡江紀念館）等。
2. 「文廟」在市區和平路北端，大成殿內新塑的孔子及七十二賢像還未完成，現為桐城市博物館所在地。文廟始建於元代延祐年間，明洪武時遷建於現址，至清同治五至八年（1866-1869）最後一次修繕，共經十九次修葺。文革時門樓、櫺星門、泮橋石欄杆均被拆毀，直到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七年纔重新修復。門前駝碑轟轟的頭和所駝的石碑也被打壞，則至今未修復。廟中藏有一九八五年參加「桐城派學術討論會」學者的題字，比較特殊的是大成殿的八角形座斗，每朵採用45度斜拱的建築方式。
3. 「張廷玉墓」和「姚瑩墓」均在縣城西北郊外九、十公里處雙溪村蒲莊的龍眠山，山路傍著一條小溪蜿蜒而行，溪水甚為清澈，車行約一小時纔到達。「張廷玉墓」稱「文和園」，位於龍眠山的「鳳形地」，該墓於「文革」時被炸燬，一九八三年起開始修復，現在已大致完成，共有七千多平方公尺，可惜廁所還是「毛坑式」的。墓在山頭上，山下先經過「張氏享堂」，乃供奉祖先牌位而為後代子孫祭祀獻禮之處，「享堂」依山勢而建，逐漸升高，堂後纔是墳墓區，墓前有華表、石獅、石羊、石虎、石馬、石武士、石翁仲等，非常壯觀，站在墓前遠眺，視野毫不受阻礙，可以看到近處的小河、遠處的青山，景緻非常好，不過我的疑問是：當時交通如此不方便，如何把那笨重的棺槨從省城運送到如此偏遠的山頭？所耗費的人力、物力又有多大？只是為了永遠保有一家一族後代榮華富貴的私心夢想，就必須如此嗎？張家是清代有名的儒者式「好官」，都如此的自私，則儒家思想的理想層面，在現實中到底能保留多少？實在令人懷疑。當時也正好遇上一批張家的後裔在祭拜，祝詞就有：「希望老祖宗保佑後代子孫賺大錢」的詞句，祭拜不是如孔子所說的「感恩」；而是私利的「祈求」，奈何？
4. 「姚瑩墓」則在另一座姚家墳山的半山腰（雙溪村小河口），與張廷玉墓相距不遠，但非常難找，必須在彎彎曲曲的山路往上走幾百公尺，如果沒有人帶路，大概很難找到，所以並沒有被破壞，不過也沒有好好維護，墓在山路邊，面對山

路，後方是一個斜坡，越往後越高，不是建在一個平面上，後方也有一些不知時代沒有立碑的墳堆，據說曾有盜墓者前來，然由於此墳係用糯米漿所造，很難被打開，又被村民發現，所以沒有被盜挖。山路兩旁雜草與小樹叢到處橫生，祇立了一個石碑曰「姚瑩墓」，墓前堆了一大堆泥土，把墓碑的下半部遮住，非常荒涼，墓碑題：「皇清誥」三大字，兩行小字，右曰：「授通議大夫廣西按察使姚公石甫」、左曰：「封淑人姚母方」，左旁文曰：「同治元年歲次壬戌季冬月」、右方文曰：「卯山西向 門人朝」，以下為土所埋，無法看清。視野也非常遼闊，站在墓前眺望，可以看到遠處青山白雲下層層疊疊的山巒，大概「風水」就是指這種風景環境而言吧！到達兩座墓的路都是往上爬升的泥土小山路，非常難走，所以朱榮貴沒有上去。

5. 在探訪「姚瑩墓」途中遇到兩位小女孩從山上採集薪材下山，年齡大約在十歲與七、八歲間，下山時發現她們還拖著樹枝，因此過去幫忙，纔發現他們所採集的薪材還真不輕，心中大為感慨，同樣年齡的孩子，祇因生長的环境不同，臺灣同齡的孩子，絕大多數被父母視同「掌上明珠」般的呵護，又是鋼琴、又是美語、又是繪畫等等，恨不得把世界上所有的好東西都送給她，哪裡捨得讓她做事。生長在此地的孩子卻要到山上砍薪材、田地採野菜，何其不公平，所謂「機會均等」，談何容易啊！惜無法助其一臂之力，奈何？政治之良窳，對人民生活之影響，亦於此可知矣。如果我是那個想當大官想的發瘋的杜甫（712-770），大概又可以發出那一類「安得廣廈千萬間」的廢話，欺騙後代一些 IQ 較低的人的感情了。
6. 再回縣城西南的「榮休院」內<sup>⑬</sup>，參觀「六尺巷」舊址，傳言張英在京為官，接到家人來信，謂鄰居吳家欲侵佔其地蓋屋。張英乃回信云：「一紙書來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家人接信遂拆讓三尺，鄰居也因而拆讓三尺，因此便形成了這一條長約一百公尺的六尺寬的巷道。
7. 再至城關鎮北大街的「桐城中學」，此校即吳汝綸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九月所創辦的安徽省第一所普通中學：「桐城中學堂」的所在地，大門有吳汝綸所題「勉成國器」之訓。該校為安徽的明星學校，至今已出現四百多位博士。校園內有吳汝綸創建桐城中學堂時的藏書樓（即圖書館之前身）：「半山閣」，今則

<sup>⑬</sup> 「榮休院」係單身退伍軍人居住處，如臺灣的「榮民之家」。

作為「音樂教室」。該校東北角即為姚鼐（1731-1815）故居「惜抱軒」舊址，其地有一棵相傳為姚氏手植的「銀杏樹」。「姚瑩墓」、「半山閣」、「銀杏樹」，均在一九八八年列為第三批縣級保護的文物。參觀「桐中」時正好遇上其圍牆倒塌，原有「桐中敲銅鐘，童男童女同上學」的字句，最後「上學」二字倒在地上；該校的運動場是將一個小山坡推平而造成的，所以比教室的屋頂還高。在校園中檢到一個一九六三年製造的貳分人民幣鑄幣。

8. 參觀「桐中」以後，由於時間已晚，只好放棄其他的古蹟，驅車趕往樅陽縣（原屬桐城），當夜即下榻在樅陽縣的「白鶴峰賓館」，由於暖氣壞掉，無法修好，所以和秋華學長在不超過1°C的低溫下，過了一個「最寒冷的夜晚」。大陸地區一些旅館的硬體設備其實已相當不錯，但管理服務的水準實在太差，像暖氣壞掉居然要等到客人反映纔知道，事實上房間早就預定了，客人未到前居然不知道先檢查，另外要求供應熱水洗澡，起先只給四個熱水瓶，而不願開熱水器，又不知先把漱洗用具擺好，必需等到客人反映纔拿出來，管理實在大有問題。

## 二月十五日（星期二）

1. 經由陳友冰教授之安排，由樅陽縣相關人士（一位女鎮長：翟樂樂小姐）之陪同，前往探訪在樅陽縣城東北方約有三、四十公里遠的「方以智墓」和方氏出家後（釋名：無可）曾為主持的佛教聖地「浮山」，墓位於浮山鎮會聖村百沙林、「浮山」亦相距不遠。因下雨的關係，該段道路由於過分泥濘，以致車子也無法通行，只好步行前往，路程大約二、三公里，朱榮貴也就無法前往。路上遇到許多成群在外閑逛覓食的大豬、小豬，在安徽南部似乎都不把豬關在豬圈中養，而是放牧的方式，讓牠們在外面自由活動。
2. 「方以智墓」在一個雜草叢生而又種有許多松樹的墳墓區中，旁邊有許多未立碑的墓，到達時還在下著時有時歇的毛毛雨，所以有一些未散的霧氣，大約十公尺外就看不見東西，墓在一個小丘陵上，墓的前方沒有更高的阻礙物，視野因此很廣，墓前有一對石獅子，又有一重刻於一九六三年五月的〈方密之先生事略〉舊石碑，一副不知何人題的對聯曰：「博學清操垂百世」、「名山勝水共千秋」。旁邊較新的立碑則題：「方以智墓」。墓的型式像個饅頭，墓碑在墳的後方，題：「方公密之府君之墓」，旁邊落款：「男：中通、中德、中履」；另一旁

是：「潘太君之墓」，落款同。在兩墓中間的墓牆上題曰：「方密之先生墓」，上方有一幅「雙龍搶火珠圖」，那顆「火珠」的中間有一顆「紅五星」，據說就是因為有此一顆「紅星」，「文革」時此墓纔能逃脫被破壞的厄運。

3. 從「方以智墓」所在地循原路往回走，約走到一半的路程，即是「浮山」的入口，當時已有一位「浮山園林管理處」的先生等著引導參觀。該山係因兩次火山爆發，經過一次溶岩侵入而成，因而出現許多奇景怪石，自南梁(397-414)建佛寺以來，一直是有名的山林清修探幽的勝地，宋仁宗(趙禎，1010-1063)曾賜匾、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曾頒《藏經》。天臺智者(智顛，538-597)、宋代遠錄、清代無可(方以智、浮山愚者：大智、弘智等，1611-1671)均曾為此地主持。據傳東漢末的左慈曾於此學道，宋代的張同之、明代的雷鯉、清代的朱作鼎亦隱居於此學道。歷來到此地尋幽探勝的名人有：唐代的白居易(772-846)、孟郊(750-814)；宋代的范仲淹(989-1052)、王安石(1021-1086)、歐陽修(1007-1072)、黃庭堅(1045-1105)；明代的何如寵(?-1641)、左光斗(1575-1625)、袁宏道(1568-1610)、袁宗道(1560-1600)、鍾惺(1574-1624)；清代的張英(1637-1708)、方苞(1668-1749)、戴名世(1653-1713)、劉大櫟(1698-1779)、姚鼐(1732-1815)等人，遺留的刻石畫像、詩詞題名，不勝枚舉。由於時間關係，無法觀賞全山勝景，導遊引導先爬上「玉龍峰」、循「玉龍背」前行，經「雷公洞」、「岩廊」、「枕流巖」而到「會聖岩寺」，寺前對聯：「會心不遠」、「聖域同登」；再到右邊的「遠公塔院」(一個裝有骨灰塔的岩洞)，然後再循原路往回走，導遊指出「晚翠岩」的位置，謂在晴天的傍晚，夕陽返照，會出現一片清翠的反光，非常好看，可惜當時是陰天，又是上午，當然無法觀賞到這一美妙的景色，只好用想像來彌補這一缺憾。張壽安聲稱太累，因此過其山而不上。
4. 浮山的岩壁上，到處可見佛像、題詩刻字，其中有陸游(1125-1210)的父親陸元鈞「陸子巖」的石刻；又有鍾惺萬曆甲寅(1614)春二月二十日：〈宵步石廊燭觀於巖壁〉詩、旁有「閩林古度」、「鄣山程胤兆」二人各一首：〈同鍾伯敬燭壁〉詩等等。「枕流巖」內有一古水井，據說夏天時井水會溢流出來，因為洞內有一種細菌形成的藻類，從外往內看會形成一片金黃色，非常好看。不過該地雖已列入旅遊開發的地區，但環境的維護實在不是很理想，例如「枕流巖」前的廣場(據說是以前和尚說經、聽經的場所)，居然變成紙屑滿地的菜圃，毛坑

式的廁所也太落伍了，而附近的環境更是太過髒亂，惜哉！

5. 中午在浮山附近的餐廳用餐，由於天氣太冷，又沒有暖氣設備，因此端出來剛切好的豬耳朵，沒有幾分鐘就又凍在一起，根本無法分開。不過進餐前的一盅熱呼呼冒著水蒸氣的八寶茶，則是非常貼心的設計。朱榮貴與張壽安因為覺得行程的安排太緊湊、天氣又冷、又有一點感冒、擔心體力無法負荷，因此希望脫隊先到黃山，不過後來考慮到交通與安全的問題，最後還是決定一起行動。決定以後馬上驅車前往宿松，晚上即住進宿松人民路的「浮玉山賓館」。由於張壽安的感冒有點嚴重，因此由陳友冰教授陪同前往當地診所診治，醫師給的處方似乎很有效，第二天張壽安就沒有再叫頭痛、要回臺灣了！

## 二月十六日（星期三）

1. 早上由宿松縣旅遊單位人員陪同，前往宿松縣城西南約六十公里，位於長江北岸的小孤山。施立業教授與徐天祥教授在途中先行下車，轉搭巴士回合肥，真是謝謝他們倆的辛苦作伴！陳友冰教授與小朱則繼續陪同參觀。
2. 小孤山是一座孤立在長江上的小山丘，高度大約不超過一百公尺，旁邊都是平地，因此顯得特別突兀，隔著長江與江西的彭澤相望，現在是枯水期，所以車子可以直達山下，水盛時則變成爲長江上的中流砥柱、一柱擎天，四周皆是江水。據說江西省一直想把小孤山納入其管轄區，理由是：小孤山應該是彭澤山的餘脈，安徽人當然不能同意，因此這個官司還沒有結束。小孤山上有「啓秀寺」，始建於唐代的高僧馬祖道一（709-788），北宋時重建稱「惠濟寺」，供奉臺灣最常見，被清康熙帝（1654-1722）封爲「天后聖母」、乾隆帝封爲「天上聖母」的「媽祖婆」，當地人稱「小姑娘娘」。蓋因將「小孤」？作「小姑」；又因「小姑」而連即「媽祖」故也。
3. 參觀活動由曾在福建學過佛法的年輕主持「行義法師」（約四十歲不到）接待，先行座談，然後由旅遊局的人員陪同，循羊腸小徑而上，小路非常陡峭，朱榮貴因而不敢上去，留在山下。環山有不少石刻，但必須坐船纔能見到。先經過「臨江軒」，因爲要沿著陡峭的小山路下去，所以只有彩鈞、秋華和我下去，在漲水期江水會到達臨江的六角亭邊，因爲現在是枯水期所以江水離亭還有幾公尺深；在「臨江軒」時看見過往的船隻鳴放鞭炮，據說自古以來船家即視「小孤山」的



山神乃是保護過往船隻的守護神，經過時都會焚香禮拜祈求保佑，放鞭炮與煙火就是拜完後的基本動作。接著繼續往山頂走，大約五十公尺左右即到達山頂，據說是當年朱元璋(1328-1398)、王守仁(1472-1528)、彭玉麟(1816-1890)曾設置砲臺的地方，另一邊的山頭則有一始建於宋理宗寶慶二年(1226)原稱「牧羊亭」；明代嘉靖八年(1529)重建而改稱「梳妝亭」的古建築，亭外有嘉靖帝(1507-1566)的「御詩碑」，不過現在立的是仿製品，原碑可能在「文革」已被破壞，殘碑還有一段留在「梳妝亭」內，駝碑的龕龕，據說摩擦其頭可以得財，因此被磨的有點缺口了，「梳妝亭」的最上方還有一間非常小的佛堂，是全山的最高點。另外在山上的鐵鍊上掛有非常多的鎖，據說是男女朋友在此掛上一鎖，即可「永結同心」故也。地理位置和風景皆不錯，可惜善男信女太多，有點雜亂無章的感覺；幾位乞丐坐在登山「一天門」的小道旁，有的甚至有點不給錢就不讓人通過的意圖；另外紙屑滿山遍野，相當不雅觀，管理實在不夠理想，應該可以加強；不過在山下特別設一個放鞭炮的特區，以免信眾到處亂放炮，倒是值得肯定。

4. 中午在寺內用素餐，主要有野菜、竹筍、菇類、木耳等，飯是比較不黏的米煮成，一粒粒分開，他們幫每人盛一大碗，約有臺灣一般碗的兩倍大，所以大家紛紛跑過去飯鍋前撥一點回去，更由小朱盛一大碗送到山下給朱榮貴。大約十二點半左右用餐完畢，隨即到「小孤山輪渡」，連車一起坐上渡江的輪船：「小孤山汽車輪渡船」，輪船戶牌：GM0069，橫越長江到達江西的彭澤，再經安徽東至、祁門、休寧，而到屯溪。渡輪的費用人民幣一百五十元，是由陳友冰教授支付的。
5. 當車子穿越黃山山脈東西走向的餘脈：大洪嶺、望江尖、大歷山、古牛降、仙寓山、雞冠石等所形成的大小山嶺時，一路行來僅遇到兩輛車子交會、一輛超越的大型長程客車等三輛車而已，可見其地人煙之稀少，當車子接近山脈的最高點(海拔一千多公尺)時，天空忽然飄起雪來，而且越下越大，司機王先生非常緊張，因為雪下的太久，無論地面積雪過深、或者地面凍住，車子均難以行走。在這種狀況下，車子熄火只要超過幾分鐘就不能再發動，車子熄火就沒有暖氣，在那種地廣人稀的山野裡，也難找到避寒之處，則到時候可真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了。還好一切平安，不過也失去雪中拍照留念的機會，彩鈞剛好在最高點按下快門，不知效果如何？
6. 剛下雪時：僅有幾片稀疏的雪花，自陰暗的天空飄下，打在車窗上，馬上就融化

了，隨著車子往上爬高，雪愈下愈大，到後來就變成一大片白茫茫的，像是有人在空中灑下一大把鹽一般，真是只有「空中灑鹽差可擬」了，至於「柳絮隨風飄」大約只能形容下小雪的情況，因為雪若下的很大，應該是很快的落下，絕對不能用「飄」來形容，只有用「落」纔能描繪其實際的表現，所以對《世說新語》記載的後代評語，大概是沒有經過實證而僅注重修辭美感的評價吧？雪花落在馬路兩旁的樹枝上、草葉上、石頭上、地面上，一片粉白，真的有「粉妝玉琢」的感覺，此時纔深切感覺古人在描寫景物時，其修辭之美、之真：真的就像在樹枝上、草葉上、石頭上、地面上等各個景物上面灑上一層白粉似的。

7. 晚上八點左右纔到達屯溪，經由黃山高等專科學校徽州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方利山先生的安排，住進黃山市屯溪區西鎮街的「花溪飯店」，他已經等我們好幾個鐘頭了。飯店位於三條河（涇江、橫江、新安江）交會處的三江口，一開窗就可以聽到流水聲，偶而還可以看到一些竹筏式的小船經過。

## 二月十七日（星期四）上午

1. 上午由方利山教授安排前往黃山高專（原：徽州師範專科學校）訪問座談，出席者有：校長暨徽州文化研究所所長姚邦藻教授、汪大白教授、汪昭義教授、畢民智教授、方利山教授、王伯壽教授等學者。首先由陳友冰教授介紹本次訪問的原因與目的，依次再由姚邦藻校長、王伯壽教授、畢民智教授、方利山教授及鍾彩鈞、林慶彰先生介紹雙方與會者，以便互相認識。姚校長等介紹說：該校成立已有二十年歷史，編輯《戴震全集》是國家重點項目之一，內容與《戴震全書》略有出入，一共花費十年功夫纔完成，對「戴學」的研究，應該有一定的影響。然後互贈圖書，他們送了一套《戴震全集》、方教授則送《戴學縱橫》等書，姚校長與王教授先行離開，其他人則留下座談。
2. 方利山教授說明編輯《戴震全集》和「徽學研究所」的情況云：因為屯溪是戴震的故里（安徽休寧隆阜；今黃山市屯溪區），所以在一九八六年成立「戴震研究會」後，就決定編輯《全集》，一九八七年六月開始進行；一九九六年二月校點整理完畢，全部刊行面世。戴震生前正式刊行的書並不多，戴氏卒後則有兩次結集，第一次是孔繼涵（1739-1783）刊刻的《戴氏遺書》，收書十五種、其次是一九三六年胡樸安（1878-1947）和許承堯（1874-1964）等編《安徽叢書》中的《戴

東原先生全集》，收書二十三種，大約有一百多萬字，不過戴氏的未刊稿，還是不斷的出現，雖然多能刊刻，但是流傳並不廣，連日本也很少，而又散處各地，想要全部彙總起來，也是不太容易的事，編《全集》的材料主要來自學校圖書館、研究「戴學」者、「戴震研究會」、「戴震紀念館」、戴氏後裔等等。戴氏的後裔現知有二百多人，散居世界各地，他們非常配合的協助尋找提供資料，北大圖書館也提供未刊稿，資料的尋找有其困難，但是《全集》還是收錄專著四十一部、單篇文章一百七十篇，新收入的專著有十三部、文章也有三十一篇，約增多一百多萬字，加上原有的百多萬字，《全集》就有二百六十二萬字。《全集》與黃山書社出版的《戴震全書》比較，則各有特色。主要有幾點：一、《全集》收錄的資料較齊全，除北大等各圖書館收藏的資料外，也擴及海外，如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等；二、戴氏標點、批注之書不收，如早期在《水經注》上的九十七條「批注」之類；三、編排的體例大致按著作性質（即內容），依現代圖書分類法的原則分類，與其他三部「全書」依段玉裁分法的混合編排不同。原本準備出版四冊，因為收集的相關資料越來越多，最後總共有六冊。四、《全集》重視的是校注整理，儘量保持原稿的面貌，原文即使訛誤也不加校訂，只是加以說明，不作評論；與《全書》之另加考訂、評論的方式有別。另外在每冊後附有前冊的「勘誤表」。屯溪地區在一九八四年四月曾召開「紀念戴震誕辰二百六十週年學術座談會」，一九八六年四月並成立了「戴震研究會」；一九八六年五月召開首屆「戴震學術討論會」，會後編有《戴震學術思想論稿》一書。由於戴震之學在徽州文化中有其特點，尤其八〇年代以後的轉變，對「戴學」的研究更趨熱烈，學校也想有所突破，因此設立了「戴震研究會」；又因為學校位於戴震生前重要的活動地區，在一九九一年乃召開「第二屆戴震國際學術討論會」，共有國內外學者專家一百六十多位參與討論，會後並編有「論文集」。編輯《全集》供花費十二年，出版之際戴氏後裔出資八萬元、清華大學出版社贊助二萬元，僅印二千套，還有一些戴震的手稿猶未收入。由於學校長期注重資料之收集，因此有關「戴學」的資料收藏較多。學校曾準備籌辦「第三屆戴震學術討論會」，約需五萬元纔能辦成，由於經費不足，因此無法舉行，如果有單位願意合辦，希望能在今年（二〇〇〇年）召開，杜維明、成中英均曾表示高度的興趣<sup>⑭</sup>。一九九四年

<sup>⑭</sup> 晉龍案：林慶彰先生與彩鈞皆表示可以考慮合作開會。

成立「徽學研究所」，現正在編一本介紹有關「徽學」的書：《徽州學概論》，內容包括「徽州學術」、「徽商研究」等，約在二〇〇〇年五月可以出版。又與復旦大學的殷寄民教授合作，研究徽州語言學，主要是有關「方言」的研究，蓋殷教授乃歙縣人。皖南文化比較閉塞，研究經費也不足，因此許多研究計劃無法展開。學校圖書館有「徽州文化資料中心」，專門收集國內外相關的研究資料。另外本地也有學者作「胡適研究」。

3. 汪昭義教授謂：一九九四年成立的「徽學研究所」之成員，包括學校的教授、博物館的研究員等，現在則因退休等因素，僅剩方利山教授一人。
4. 畢民智教授介紹說：方利山教授對《水經注》的研究較為投入；另外中文系的金嘉恆教授則從演變史的角度，對乾嘉語言學派作綜合性的研究。
5. 方教授回答張壽安有關戴震至北京之故及與傳教士之關係云：在屯溪戴姓與吳姓為兩大家族，惟至戴震之父時已經家道中落，生活困苦，當時族中因爭祖墳而打官司，休寧縣官受賄，欲羅織戴震「文字獄」之罪，戴震害怕受害所以逃到北京。而此地的傳教士主要是西班牙籍，天主堂在解放前猶存；至於戴震與傳教士的關係如何？並無相關的資料，故不知。有些學者考證認為《四庫全書總目》中有關天文、地理的〈提要〉，係戴震所撰，然並無直接證據。
6. 汪教授認為戴震有關天文、地理的學問，受到江永的影響較有可能。江永在測算古代數學的知識，可能參考了西方的思想，戴氏本人則可能性甚小；倒是江永、梅文鼎最有可能。剛剛提及的《徽州學概論》一書，屬講義性質，希望能結合普及性與學術性為一體，內容包括：徽州學研究與現代的聯繫、六大名人（朱子、方以智、戴震、俞樾、胡適、陶行知【1891-1946】等）的研究，目的是宣揚本地的文化，提供中小學生與導遊的普及性讀本。在學術交流方面有：江西上饒師範學校的「朱子研究」、浙江的杭州、金華、及南京都有「徽州文化研究會」的分會。
7. 畢教授謂：由於人文學科的宣傳不夠，因此影響到經濟的創收，經濟問題無法獲得解決，研究的經費就沒有，因此創建「徽州文化園」，希望將文化研究轉成旅遊資源，使得人文研究可以獲得經濟上的資助。又說白盾（吳文慧）教授的新書《歷史的磨道—中華的帝制》一書，論中華文化受帝制的影響，值得參考。
8. 座談結束後，由方教授陪同前往參觀戴震的遺跡：首先到隆阜正街一一八號位於白鶴溪旁的「戴震紀念館」，該館係一九八三年所修，是在一九二四年戴氏後裔

在祖居「搖碧樓」所創的「東原圖書館」基礎上修葺而成。該館比較乾淨，原藏有戴震生前所讀之線裝書九千多冊，因曾遭受水災，故略有損失，當時正逢新年假期，故無法觀其藏書。有黃澍題書之對聯曰：「故里仰高風幽篁深隱讀書處」「陳牋留遺澤古木長蔭洗硯池」。另一聯曰：「訓詁開乾嘉學派」「哲理蘊唯物光輝」。

9. 其次則參觀「戴吳氏古井」，該井原係戴氏所有，後因戴氏中落，吳氏較發達，於是將井據為己有，並將原本刻在井欄的「戴氏古井」改成「吳氏古井」。不過現在井已經乾涸，並且變成一個堆滿垃圾的廢井了。
10. 再參觀戴氏出生的故居，這時已成為「隆阜小學」的一部份，除留下以磚塊封住的大門外，已無痕跡可循。接著去看戴震的「洗硯池」<sup>⑮</sup>，雖有個水池，不過已經變成一個養牛的地方，現在居住的是戴氏第三十五代後裔：戴文生。顯然並不太在意祖先的遺跡，所以該池雖在他家門前，卻沒有好好的照顧整理，哀哉！

## 二月十七日（星期四）下午

1. 下午由陳友冰教授大學同學汪福琪先生與凌班長、及方利山教授陪同<sup>⑯</sup>，前往黟縣東方八公里處的西遞古村。首先經過本來有夾岸桃花溪水的「桃源洞」，相傳是陶淵明〈桃花源記〉所記載之地，該洞本於懸崖之上，為通往縣城必經之口，惜在五〇年代因開公路而炸燬，僅刻一碑為紀念，從此夾溪盛開的桃花也就逐漸消失了。
2. 西遞古村向有「桃花源里人家」之稱，村中多為胡姓人家。傳言此胡姓乃唐昭宗李晔（867-904）之子避朱溫（852-912）之亂，遷移至歙州婺源而隨奶娘改姓胡：胡昌翼，到五氏祖胡士良乃從婺源考水遷入西遞，所以西遞是胡姓的一姓村。西遞原名西川、又稱西溪，蓋村中三條溪水皆由東向西流故也，清代設驛站而改稱西遞，始建於北宋皇祐年（1049-1054）間，全村平面如一船形。人口在乾隆（1736-1795）時最盛有一萬多人，今則有一千多人，有房舍四百二十棟，

<sup>⑮</sup> 由於口音不同之故，張壽安聽成「實驗室」、蔣秋華聽成「許願池」。

<sup>⑯</sup> 汪福琪先生贈送每人一本由其和章綱、洪樹林、章偉等主編，東方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胡適家書手札》一書。

其中明清古民居有一百二十多棟，現存最早的是明代萬曆年間（1573-1620）蓋的，最多的是清朝康熙（1662-1722）、乾隆年間蓋的。其祠堂分為總祠、支祠、家祠三種。村口的廁所是幾日來所見公共廁所中最乾淨者，收費五角，林慶彰先生戲稱為「四星級廁所」。

3. 到達西遞首先入目的是村口一座三間、四柱、五樓式，十二點三公尺高、九點九五公尺寬，建於萬曆六年（1578）胡文光牌坊，胡文光（1521-1593）是胡氏家族第十八代子孫，登嘉靖三十四年（1555）進士，後為荊王府（長沙王）長史，政績顯著，故皇帝特別恩准其生前即建此「功德坊」，上方有「恩榮」二字、下方東面為「荊藩首相」、西面「膠州刺史」，其下為「登嘉靖乙卯科奉直大夫胡文光」。牌坊底座有四隻倒立的石獅子，獅頭朝下，使得重心下移，具有穩定的作用。牌樓上又刻有「八仙」和四位「文臣、武將」，據說寓有「出將、入相」的期許、及「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用意；屋脊是「鰲魚」，有「獨占鰲頭」之意，而上翹的錫製的鰲魚鬚，則具有避雷針的作用。西遞本來有十三座牌坊，多為「孝子坊」「貞節坊」，「文革」期間被打掉十二座，留下這一座本來是作為負面教材用的，現在卻成為「寶物」了，既可笑又可悲吧！
4. 進入村內先經大路街、再到橫路街，參觀過：明經園、存養家塾、桃李園、西園、東園、繡樓、大夫第、敬愛堂（胡氏宗祠）、履福堂等。徽州古建築的三絕：木雕、磚雕、石雕，在此均可以看到不少精品，最有趣的是「商字門」，就是將門設計的像缺個「口」的「商」字，照他們的解釋是：因為商人地位低落，為了滿足商人的「阿Q心理」，因此設計此類門，無論何等身份的人，經過此門，即無形中屈居於商人之下，以此表達商人「不願屈居人下」的心理，由此亦可見建造房屋之時，商人的自我意識已經相當清楚，對自己職業的「自信心」也已有相當高的肯定，換言之；經濟發展所帶來財富的累積，增強了商人的自信心，因此纔有這種不甘被藐視的心理，反而還有「高高在上」的自大心理。「瑞玉庭」有一楹聯曰：「快樂每從辛苦得」「便宜多從吃虧來」，其「辛」字下方作「羊」，多了一劃，表示要比別人更加辛苦；「多」字，去掉了「夕」字中央的一點，表示「上」要少佔一點便宜、「下」要多吃一點虧。「西園」、「大夫第」、「繡樓」都是清代道光年（1821-1850）間知府胡文照所建，「西園」是個園林宅院，其「井花香處」之題額，表示在裡面有花園、水井、廚房；「種香圃」則係花園。「繡樓」本是胡文照退休後一座修心養性的閣樓，門洞上方鑲有

一小篆體「作退一步想」的石雕題額，而其樓之牆角也刻意讓出一步，並建成「平面」而非一般的「直角」。「桃李園」是清代秀才胡允明的居家與教書之場所。「東園」建於清雍正年間，其廂房的房門上有木雕的「冰梅圖」，寓有「十年寒窗」、「不經一番寒澈骨，那有梅花撲鼻香」之意；另外有五隻展翅的蝙蝠所形成的「五福捧壽圖」。「敬愛堂」始建於明萬曆間（1573-1620），明末遭火重建，落成於清，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二年重修。原為胡仕亨住宅，後擴建為「族祠」，掛有「天恩重沐」、「上國琳琅」、「四世承恩」、「盛朝英俊」等四塊匾額，另有懸於供奉廳，相傳是朱熹手書的「孝」字，從右側看像個打躬作揖的人，從左邊看則像一隻戴著帽子的猴子，據說寓有「盡孝為人類；不孝為畜生」的涵意。另在左邊的牆角下發現一塊棄置在一堆石塊中，上方刻有〈自贊〉及王仲儀〈贊〉、下方刻有雲峰先生遺像的石碑，似乎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實際上以「雲峰先生」為號的乃宋末元初的婺源人胡炳文（1250-1333），這畫的應該是胡炳文的遺像。「履福堂」是胡積堂的故居，始建於康熙年（1662-1722）間，房中有不少楹聯：如「孝弟傳家根本，詩書經世文章」、「世事讓三分天寬地闊，心田存一點子耕孫種」、「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等。後廳有一塊明代刻的「魁星點斗圖」石刻，係現在的主人胡福基先生細心洗刷一塊無人理會的舊石塊後所得，可知大陸遍地皆寶的實況，惜乎大部分中國人民猶不知愛惜保存，若再不加強傳統精神教育，激發民族自信心，擺脫從「鴉片戰爭」以來逐漸形成，而在「五四運動」以後成為「刻板印象」的：在文化上「崇外輕己」，恨不得變身為「黃頭髮、藍眼珠、高鼻子」的非正常心理現象，恐怕流失的東西會越來越多呢！正廳的桌上擺設：瓷帽筒<sup>①</sup>，東瓶、西鏡、正中為時鳴鐘，「瓶、鏡」之寓意為「心平氣和、四季平安」；三者則共寓有「終身平靜」之意。每家在大門後都有一個四方形漏空的天井，其設計雨水均是往內流，天井係採光之用，雨水向內流，則是商人依五行而生的一種吉利風水想法，蓋金生水，聚水即聚財也。最有趣的是我們在許多書店找不到的《徽商研究》一書，居然在此找到一堆，所以全部買下，在大陸選購書籍可真是不容易，還得有一點運氣呢！由於時間關係只能如此走馬看花，接著就離開「船形」的「西遞」，而到「臥牛形」的「宏村」參觀。

<sup>①</sup> 清代官員都有官帽、頂戴，因此有此物以便客人置放帽子，有時「時鳴鐘」也有此作用。

5. 「宏村」始建於南宋紹興六年（1136）的汪彥濟，有十三戶，本另有謝、董、韓三姓人家同居此，後為汪姓所逼而遷移，其中韓姓還與汪姓發生大規模的械鬥後纔遷走，汪姓遂改「韓村」為「宏村」。南宋德祐、景炎年間（1276）山洪爆發，迫使雷崗山山溪改道繞村之西邊而行，乃名之為西溪。永樂年間（1403-1424）汪思齊開始聘請高人規劃此一臥牛形之村莊建築，至其子汪升平纔真正落實此一計劃：引西溪水鑿圳而繞村屋，又與村中泉水匯合成一半月形池塘，稱「月沼」，繞屋的長圳為「牛腸」、月沼則是「牛胃」；明朝萬曆三十五年（1607）由汪奎元會合村人十六家集資在村南開鑿出一個弓背朝村外、弓弦靠村子的「弓形」池塘（仿西湖之形式），稱為「南湖」，即「牛肚」。然後又在西溪河上建了四座橋，是為「牛腳」，村口的兩棵五百年左右的古木：楓楊（紅楊）樹、銀杏（白果）樹<sup>18</sup>，則為「牛角」；由東向西的村居民房則是「牛身」；雷崗山則是「牛頭」；今存狀況較佳的明清古建築有一百三十七棟，這就是有名的牛形水上村落之情況。
6. 「宏村」所以會有這種流水繞村屋的設計，主要是為了防患火災之故，不過在古代還沒有「自來水」的概念時，在十五世紀初的永樂年間居然就能夠規劃設計出這種具有現代「自來水」供水系統概念的工程，實在令人佩服，只要將送水的溝渠換成水管，不就是現代的「自來水」嗎？而且還定下規矩：洗東西必須在早上八點以後，以前則是作為飲用水，所以不能污染；因為後來挖了井，這個規定也就無疾而終了。
7. 參觀「宏村」是由縣城來的胡小姐導覽，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牛肚」，從其中的小橋進入村莊，由於已經到了下班時間，所以也只能走馬看花般的經過：南湖書院、半月塘（月沼）、樂緒堂（汪氏總祠堂，門前有「篤禮崇義」之題字）、承志堂、德義堂<sup>19</sup>、樹仁堂等。其建築特色與西遞村同，主要表現在：木雕、石雕、磚雕的細緻傳神上。「南湖書院」建於清嘉慶十九年（1814），原稱「以文家塾」書院；「承志堂」係清代鹽商汪定貴在咸豐五年（1855）所建，是標準的徽派建築。汪氏是在江西九江經商而發跡的。此屋在前廳的天井下檐四根柱子上雕有「漁樵耕讀」四個人像；下方則是「百子鬧元宵」，刻有一百個神情各異、

<sup>18</sup> 晉龍案：據說村中有紅白之事，需至村口繞樹而行；喜事則繞紅樹、喪事則繞白樹。

<sup>19</sup> 「德義堂」位於宏西村際聯鎮13號，屬上水圳，屋中有一乾隆年間之墓碑，作為廚房殺魚、切菜之用，大概是大陸此類碑刻太多，因此覺得不足為奇吧！



動作不同的童男。後廳的木雕則刻有「郭子儀上壽圖」、「九世同堂圖」，蓋前廳乃出入之所，故以漁樵耕讀，表各自量力而入各行各業、各顯神通、各闢出一番事業之意；後廳則是父母所居，故以高齡長壽、多子多孫、代代發達之寓意為雕刻之主題。另外在前廳上方有一隱密之空間，據說是給家中的閨女透過所開的小窗，以窺視有可能成為乘龍快婿的年輕男子之用，看來清代的婚姻還是多少稍微尊重少女的選擇，當然不是絕對完全自由的選擇，不過至少也有選擇的機會，而不是毫無選擇的全命令式的「硬配」；又有打麻將專用的「排山閣」和抽鴉片專用的「吞雲軒」。「排山閣」內還有一個暗門，作用是晚輩打麻將之時，如果長輩來巡視，就趕快躲入其中，以免發生尷尬的場面；長輩也不會故意把躲在裡面的人揪出來，這樣就可以顧全雙方的體面。看起來是有點掩耳盜鈴的味道，但是深思起來，不也有留一點餘地，不要逼人太甚的味道嗎？傳統大家庭如果沒有這一點人情味，恐怕也很難維持，所謂「不啞不聾，不得作翁姑」，不也有此意嗎？另外一個特殊設計，就是在外牆裏側再加上一層木質的牆板，一但有盜賊敲打屋外的牆壁，屋內就會聽到聲音，因此可以事先加以防範。正廳旁邊還有一間管家居住的房間，因為空間不足，因此全部都是以三角形為格局設計建造而成，非常特殊。據說「承志堂」的木雕所以能夠保存完整，主要是在「文革」期間，有人用黃泥將它糊起來，並在上面寫上「毛澤東語錄」之故，後來還費了一番功夫纔把這些乾硬的黃泥清理乾淨。由於天色已晚，只好趕快離去。

8. 晚上到屯溪老街，林慶彰先生買到一套清末民初的《四書讀本》；鍾彩鈞先生買了一些宣紙；其他人也各有斬獲，買了一些相關的書。還遇到剛從黃山下來的臺灣師大美術系的學生。後來大家討論是否要上黃山，但因為時間太過緊湊，僅能抽出半天的時間，而遊黃山最好是能在山上住幾天，這樣匆匆忙忙根本無法觀賞任何景物，所以最後還是決定過其山而不上。

## 二月十八日（星期五）上午

1. 早上先參觀「徽州文化園」，這是要結合歷史研究與旅遊資源而開發的庭園，還沒有完全建造好，本來預備建十座仿古牌坊，僅完成了八座：即「程朱闕里」、「淵明舊里」、「四世一品」、「紫薇近侍」、「偶然」、「龍興獨對」、「忠烈祠」、「雙壽承恩」等，這些牌坊都是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不過現在都已經

不見了。另外還有一些近人題字或題詩的石雕，另外還建有一個「文昌閣」，內有「宋明清徽州狀元一覽表」和「宋明清徽州進士人數一覽表」兩塊石碑，三個朝代徽州的進士總共有一千七百二十三人：歙縣五百四十四人（宋：一百二十八、明：一百八十一、清：二百三十五）、婺源四百六十人（宋：二百九十三、明：一百零九、清：五十九）、休寧四百一十四人（宋：一百五十九、明：六十五、清：一百九十）、祁門一百三十六人（宋：七十七、明：五十、清：九）、黟縣一百一十七人（宋：九十二、明：十三、清：十二）、績溪六十二人（宋：三十三、明：十八、清：十一），歙縣考中進士人口的發展最大。又根據導覽小姐之解釋，石獅子身上捲毛的多寡有一定的規矩，不可以隨便加多或減少，最多是一品官的十三捲，以下按官階大小由一品到七品依次類推遞減。母獅帶小獅，寓有「太師」和「少師」之意；雄獅帶球，則有「扭轉乾坤」之意。由於天氣又冷又下著雨，所以就粗略的走過一趟，隨即離開。

2. 接著經過鄭村而到自宋代以來即為鮑氏家族聚居，在歙縣縣城西方約六公里處的棠樾村，參觀其牌坊群，由當地一位神情有點懶散的中年婦女導覽，共參觀七座代表忠、孝、節、義的牌坊<sup>20</sup>、一座亭子（驄步亭）、一座男祠（敦本堂）、還有比較特殊的女祠（清懿堂）等。因為時間緊迫所以隨即前往縣城內參觀「許國石坊」，結束上午的行程。
3. 棠樾村是清代兩淮鹽務總商鮑志道、鮑漱芳的故居，一般的牌坊都立在村口或祠堂邊，不過像棠樾這樣擁有「忠孝節義」四類牌坊者，就今所知，也僅此一家而已。「棠樾」原名「唐越」，改成今名的原因是：取《詩經·甘棠》歌頌召伯之事，因此詩而有「棠蔭」一詞，表德政之意，而「樾」字乃樹蔭之意，改名「棠樾」，正表示紀念歌頌先賢的德政；又有「棠川」、「棠村」、「龍山」之別名。石坊的排列由村內往外依次是：(一)「鮑燦孝行坊」為四柱三間一樓的建築，建於〔明〕嘉靖十三年（1533）、清乾隆四十三年（1777）重修，這是因為其孫鮑象賢（1496-1568）官至兵部左侍郎（正二品）而追贈三代，由皇帝下旨旌表，故有「聖旨」兩字，其下則為「旌表孝行贈兵部右侍郎鮑燦」，坊上雕有

<sup>20</sup> 即：慈孝里坊【孝】、鮑燦孝行坊【孝】、官聯台斗坊【忠】、人欽真孝坊【孝】、脈存一線坊【節】、矢貞全孝坊【節】、樂善好施坊【義】；另有「鮑鄞山監察御史坊」、「鮑楠戶部員外郎地官坊」、「鮑同仁狀元坊」三座已經倒塌。

「獅子戲球圖」，表示「勇武」之意，也表示鮑氏是武將不是文官。(二)「慈孝里坊」建於永樂十八年（1520），弘治、乾隆、道光均曾加以整修，是永樂帝（1360-1424）看了《宋史·孝義傳》的記載，而下旨興建的，目的是表揚宋末元初（1276）鮑宗岩、鮑壽孫父子為賊所綁架而互爭一死以保護對方，因而感動盜賊的慈孝事蹟。「御製」兩字表示是皇帝親自發起，而用國家公款建造的，其旁有永樂帝〈慈孝詩〉云：「父遭盜縛迫兇危，生死存亡在一時，有子詣前求代死，此身遂保百年期。救父由來孝義深，頓令強暴肯回心，鮑家父子全仁孝，留取聲名照古今」，乾隆帝下江南曾到棠樾，也因此事而寫下了「慈孝天下無雙里，錦繡江南第一鄉」之名句。其上雕刻有「八仙」的寶物，是為「暗八仙」。(三)「矢貞全孝坊」另一面是「立節完孤」，建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是旌表鮑文齡的另一半汪招，從二十六歲守寡，並教養兒子成為名醫的事蹟。「驄步亭」因為亭頂像個官帽，所以又稱為「官帽亭」，始建於明隆慶間，清乾嘉時曾加整修。是明代鮑獻書、侄子鮑元臣為紀念西漢直言敢諫，常乘青驄馬出巡的御史鮑宣而建。(四)「樂善好施坊」，嘉慶二十五年（1820）建，又有「旌表誥授通奉大夫議敘鹽運使司鮑漱芳同子即用員外郎鮑均」一行字，這是獎賞鮑漱芳、鮑均父子熱心公益事業的牌坊，因為鮑家曾協助發放安徽、浙江、江蘇等三省三年的軍餉；又在黃、淮發生水災時，捐助糧食存活十多萬人；且修築淮河河堤八百里，平時則置義田、辦義學、鋪橋修路、重修文廟、文昌閣、忠義祠等等，義行不勝枚舉，所以嘉慶帝恩准建造此一「義」坊。(五)「脈存一線坊」的另一面是「節勁三冬」，建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是旌表鮑文淵的繼妻吳氏，二十九歲守寡，盡心扶養前妻之子鮑元標，又重修鮑家九世的祖墳，因而受到旌表，不過因為是繼妻，所以「節」字底下的偏旁「卩」字有點歪斜。(六)「人欽真孝坊」的另一面為「天鑑精誠」，乾隆三十九年（1774）下詔旌表，嘉慶二年（1797）建造，曰：「旌表孝子鮑逢昌」。旌表明末清初以十三歲之幼齡而萬里尋親，且不辭辛勞為父母尋藥治病的鮑逢昌。(七)「官聯臺斗坊」的另一面是「命渙絲綸」，此二語皆出自隆慶二年（1568）隆慶帝之〈明兵部左侍郎特贈工部尚書鮑象賢誥命〉一文。天啓二年（1622）建、乾隆六十年（1795）修，橫額又有「贈工部尚書鮑象賢」等字。鮑象賢為嘉靖八年（1529）進士，鮑燦之孫，鮑象賢因平定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的動亂，因而死後獲此殊榮，故曰「恩榮」。

4.「敦本堂」即「男祠」，是鮑象賢於嘉靖年間辭官歸鄉時為奉祀其八世支祖鮑慶

雲（宗名萬四，字澤叔）所建，嘉慶初鮑志道與鮑漱芳父子出資重修擴建，嘉慶六年（1801）修成。一九六二年曾加改建，「文革」時遭破壞，一九九五年重建，原名「萬四公支祠」。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間于右任（1879-1964）的學生鮑昭達、柏歲寒二人在此創辦「右任中學」時，曾以「敦本堂」作為學校的大禮堂。祠堂坐北朝南，三進五開間，祠堂內有許多塑像，表現鮑氏家族發跡的過程<sup>②</sup>，以及刻有嘉慶帝關於鮑芳陶「抗僉誤課」三道「上諭」的石刻文；又有〈公議敦本戶規條〉，〈公議體源戶規條〉及〈徽商商德〉等方匾，「敦本戶」、「體源戶」係指同源的兩個宗族系統家族。

5. 「清懿堂」俗稱「女祠」，始建於清嘉慶初年（1796-1820），係由鮑啓運起造，再由其子鮑有榮擴建完成。鮑啓運為鮑志道之弟，八歲喪母，長大後思念母恩，見祠堂僅供男主，未奉女主，覺得是對祖妣的不恭，於是創建女祠，然猶不滿意，因此遺命其子重建，以頌揚鮑氏歷代貞節慈孝德行的婦女。祠堂坐南朝北，以合《易經》男乾女坤，陰陽相悖之原理；再則「北向」的另一用意，則是從《詩經·衛風·伯兮》「焉得萱草，言樹之背」之「背」指「北堂」，乃母氏所居，以表頌揚母恩母德之深意而來。入口位於祠之西北角，為三進五間式建築，同樣擁有徽州建築應有的「三絕」之特點。由於鮑啓運在清代就知道為婦女立祠，肯定婦女的地位，因此一九九四年重新修復此中國唯一的「女祠」時，「亞太地區旅遊協會」（PATA）曾為此而捐資協助。在最後一進還展出一批「石雕牌坊模型」，製作的相當精細，維妙維肖，不過還有一點點小瑕疵，就是「許國牌坊」在裝配時，將其「官銜」石版的位置給裝錯了。
6. 「許國石坊」在歙縣縣城「陽和門」內，即解放街與打箍井的十字路口上，始建於萬曆十二年（1584），是萬曆帝（1563-1620）應十九位進士的請求，恩准其為太子時之師許國（1527-1596）所建的功德坊。許國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進士，官至內閣大學士，是朝廷三位輔相中排名第二位的大臣，此坊建於許國生前，故曰「恩榮」。石坊的形式是全國獨一無二的四面八柱牌坊，故俗稱「八角牌樓」，整座牌坊由前後兩座三間四柱三樓與左右兩邊單間雙柱三樓的牌坊組

<sup>②</sup> 大概稱「敦本」即含有不能忘本之意，故以這些表現祖先辛苦創業的塑像，用來勉勵後代子孫，不過我很懷疑那些從小含著金湯匙長大的納褲弟子們，會因為看了這些塑像而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改變，當然若能再加上其他配合的措施，則又另當別論。

成，石坊上的「恩榮」、「先學後臣」、「上臺元老」、「大學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許國」等大小字，係由當時在歙縣江村當私塾教師的董其昌（1556-1637）所書。石坊上的雕刻多隱含寓意：南面「巨龍騰飛圖」，意為皇帝南面而王，而許國則對朝廷忠誠不二；北面「瑞鶴翔雲圖」，意為天下太平和許國人品高潔；東面「魚躍龍門」，說明許國乃由科舉正途出身；西面「威鳳祥麟」，謂賢能之材出現於盛世。另外「恩榮」表示係皇帝賜予之恩典與榮耀。署名在石坊上的許國門生，右邊是：郭恩拯、王之敬、張浩吳、羊可立（1577進士）、同標；左邊是：高時（1568進士）、于翰（1574進士）、胡邦彥、龍膺（1580進士）、陳九官（1577進士）等十人。許國在萬曆十二年（1584）十月告假三個月回到家鄉，以便督造此一石坊，當時這個超大型的功德坊已經在設計建造，按照制度許國僅能造四柱石坊，但門生為表達和顯耀許國的榮耀，因此堅持要幫他豎與眾不同的八角樓，後來許國也答應了；到萬曆十三年（1585）四月初，石坊建造完成，許國纔回京師，次日早朝面見皇帝時，故意一語不發，皇帝不滿的責備他請假三個月，卻半年後纔回京銷假，許國辯解說：「工期太長，所以延誤」；皇帝不解的問：「建造一個四角石坊，工期要超過三個月，未免過分延宕；即使是八角的石坊，也該建成了！」許國馬上向皇帝請罪，說自己因為拗不過門生的請求，正是立了一個八角石坊。皇帝楞了一下，大概不好因為這事降罪自己以前的老師，現在的大臣，所以就大方的免予議罪了，這就是出現這個全國唯一的八角石坊之由來。

7. 「許國石坊」旁正有一家「新華書店」，裡面有不少書，除朱榮貴繼續在錄影拍照外，林慶彰先生、彩鈞、秋華和我就進到裡面去，為圖書館、經學研究室和自己選購研究所需相關的書籍，一則可以躲雨、一則可以找到一些別地買不到的地方性之書籍，各人皆有不同的收穫：彩鈞買了一些地圖、我們三人為自己和公家買了一堆書，一直帶到杭州纔寄出，真是自討苦吃呢。

## 二月十八日（星期五）下午

1. 中午回到晚上要下榻的「披云山莊」（黃山市歙縣縣城披云路五號）用餐，順便把行李放下，由於此「山莊」係依山壁而造，所以格局有點怪，轉了六、七個彎，爬了四、五層樓梯，纔到達下榻的房間，所以常有人迷路。餐後由汪福琪先

- 生與凌班長陪同前往績溪，因此請方利山教授先回屯溪，以免耽誤他太多的時間。朱榮貴也因為太累了，所以留在房間休息。
2. 未到績溪之前，經由鍾彩鈞先生的告知與堅持，前往參觀考察「古紫陽書院」，書院在「歙縣中學」校園內，今存三物：校門口有一個張貼科舉放榜時書院錄取名單的四柱三門三樓式石坊，最上層書「甲第」二字、其下第二層空白、底下第三層分三格：中間是「狀元」、左為「解元」、右為「會元」；另一面的最上層曰「科第」；以下第三層：中為「榜眼」、左為「傳臚」、右為「探花」。另一個是重修過的「明倫堂」，今為「安徽省歙縣中學校史展覽館」。還有一個座落在一間傳統「毛坑」前，書有「古紫陽書院」的石門坊。案：歙縣紫陽書院有二，一在紫陽山上，係正德年（1506-1521）間太守張芹（1466-1541）改「老子祠」為之；另一個就是現在參觀的「古紫陽書院」，本是明初僉院黃廷桂於永樂十八年（1420）創建於縣學右者，原亦稱「紫陽書院」，後廢。乾隆五十五年（1790）曹文植（1736-1798）、鮑志道、程光國等倡議復建，因改此名，以別於紫陽山上之官辦的「紫陽書院」。
  3. 接著前往參觀考察：面對「龍鬚山」，位於「龍川」小溪旁，座落在績溪縣瀛洲鄉大坑口村的「奕世尚書坊」與「龍川胡氏宗祠」。「奕世尚書坊」建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臨龍川小溪而立，是為褒獎戶部尚書胡富（1445-1522）、兵部尚書胡宗憲（？-1565）而建，因為兩人都是胡焱的後裔，胡富為三十世、宗憲為三十四世，故曰「奕世」，即世世代代之意；另外胡富是成化十四年（1478）進士、胡宗憲是嘉靖十七年（1538）的進士，兩人剛好相隔一甲子（六十年）登進士第，這也是稱為「奕世」之故；這是一座四柱三間五樓式的建築，坊頂為歇山式，正脊兩端「鰲魚相對」、中間置「火焰珠」。主樓正中「恩榮匾」旁盤著「雙龍戲珠紋」；下方南北兩面分別書有「奕世尚書」、「奕世宮保」四字，據說是文徵明（1470-1559）的手筆；以下一層則書「太子少保胡富太子太保胡宗憲」；再下一層的左右兩間則書「青宮少保」、「青宮太保」，中間石板還有一堆文字，可惜因為下雨天光線過分陰暗，又由於字體太小，再加上本人近五百度左右的大近視，因而無法辨識。另外附近本來還有五座和此坊同一年代，也是為這兩位官員建造的紀念性石坊，在「文革」期間，被偉大的紅衛兵們在「破四舊」時給「破」掉了，惜哉！
  4. 「龍川胡氏宗祠」在小溪的另一邊，與「奕世尚書坊」相距不到五十公尺，此祠

始建於宋，明嘉靖年（1522-1566）間大修，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重修，「文革」期間曾遭破壞。祠坐北朝南，三進東西對稱：由影壁、平臺、門樓、庭院、廊廡、尙堂、廂房、寢室、特祭祠等九大部分組成。經由汪福琪先生的紹介，纔知其木雕之精絕，真是令人嘆為觀止，不只維妙維肖，簡直是活生生的出現在眼前，從來沒想到雕刻的刀法，竟然可以和國畫的筆法媲美，以荷花梗為例：折斷的、枯萎的、風吹動的，均能夠將其中細微處表現出來，何祇栩栩如生而已，簡直就是具有生命的活物了！很難形容，去看看就知道了。經由一個狹隘陡峭的木梯，可以爬上二樓，據說是放置那些「桃」的神主牌、開宗族會議、避難的場所。正祠東邊還有一座「副祠」，是一座丁姓人家的祠堂，胡姓宗祠內有丁家的祠堂，實在有點奇怪？汪先生解釋說：龍川村像一隻船，船在海中如果沒有錨，就無法停泊靠岸，所以請一位丁姓人家把船「釘」住，以免船到處漂流，因此纔有這個奇怪的現象。不過更奇怪的是這一丁姓人家至今已相傳十六代，卻代代單傳，既不斷也不多；更有趣的是此祠建成也有四百多年了，至今從未發現過一隻蜘蛛，所以祠中看不到蜘蛛網，你說奇怪不奇怪？祠中還保存一塊文徵明（1470-1559）手書的「世恩堂」匾，還有一隻據說是從漢古墓挖出來的小「石獸」，這隻「石獸」被棄置在一棵桃樹下風吹、日曬、淋雨、蓋雪，顯然未被重視，可惜他們不贈送。

5. 據說在對面的「龍鬚山」上，以前都住有一些會武術的得道高僧，當年戚繼光（1528-1587）就是一個跟著某一位高僧從福建來的小沙彌，後來這位和尚把戚繼光送給當時有「塌皮秀才」之稱的胡宗憲作跟班，「塌皮」是績溪方言，意為整天穿著拖鞋浪蕩的模樣，大概就是所謂「弔兒郎當」吧？據說胡宗憲的母親是在夢見一個貴人來參拜後出生的，顯然還有一點來歷，和尚大概知道他的來歷，所以訓練戚繼光來幫他。後來胡宗憲果然重用戚繼光，因此纔造就了胡、戚兩位在明代驅逐「倭寇」戰役中的偉大事業。
6. 簡略的參觀後就回到「披云山莊」夜宿。晚上十點多居然還有人打來兩次問「要不要按摩」的怪電話。

## 二月十九日（星期六）

1. 結束整個安徽省的參觀訪問行程，早餐後，約八點多乘車離開「披云山莊」，前

- 往杭州。約在十二點半左右抵達杭州，住進西湖旁北山路七十八號的「香格里拉飯店」三三八號房。先與陳友冰教授、小朱、王師傅合影留念，感謝他們從合肥一路作陪，共同坐車行走一千二百多公里的辛苦，然後共進午餐，餐後陳教授與小朱即隨原車返回合肥。朱榮貴也脫隊自行活動去了。
2. 整個下午就泡在杭州的「新華書店」內，首先把別處購買的書托寄後，就在店內的三層樓間選購書籍，直到七點左右纔離開，然後到仁和路和延安路交叉處的「知味觀」用餐，其中比較特殊的當然就是杭州特產的「蓴菜湯」和「東坡肉」了。
  3. 今天正是「元宵節」，杭州也有一些大型的「燈會」活動，但由於細雨綿綿，天氣也冷，因此大家提不起興致，餐後也就直奔飯店，儲備明天的活力去了，只有朱榮貴自己跑去觀燈。在飯店中打開電視機，無意中看到一個介紹臺灣的環保工作，又特別介紹臺北市的「垃圾焚化爐」、以及街道的乾淨情況，並希望大陸的城市加以學習的節目。

## 二月二十日（星期日）

1. 早餐後就開始參觀杭州的名勝古蹟：岳王廟、坐船到「湖心亭」過「三潭印月」、上蘇堤、到張蒼水（煌言，1620-1664）先生祠與章太炎先生紀念館、蘇東坡紀念館等地方。
2. 「湖心亭」旁乾隆帝的「風月無邊碑」，因為只寫出「虫二」兩字，因此不少人不知此碑何用？同船的一位帶領一家子東歐人旅遊的導遊，還特地考了一下秋華呢！
3. 中午在「香格里拉飯店」用餐，特地點了一份「東坡肉」，發現大不如「知味觀」，不但油膩，而且也太鹹，更別提外觀顏色、味道之不如其了。
4. 下午租了一輛趙國華先生私有的「白牌車」，先至「靈隱寺」（進門旁多了一個人工造的「中華石窟」，正好遇到臺灣來的「進香團」）、再至「浙江賓館」（林彪【1907-1971】建造的地下工事，稱「七〇四工程」）、出產龍井茶的龍井（井旁有一位中年婦人兜售「龍井茶」，林先生嫌她開價太高，所以沒有人買，因此臉色非常難看）、天下第三的「虎跑泉」（內有「李叔同【弘一，1880-1942】紀念館」）、錢塘江旁月輪山麓的「六和塔」（已近下班時間，故



無法登塔)、再回新華書店買書,又到「知味觀」用餐,然後到「采芝齋」購買禮品:酒、藕粉後,回飯店休息,結束了一天忙碌的行程。

##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1. 早上到浙江大學宿舍探望養病中的吳熊和教授,吳教授氣色不錯,衷心的祝福他戰勝癌細胞,早日康復。
2. 接著回到「孤山」,先參觀「西泠印社」一些相關的建築物,再到「放鶴亭」與「林和靖墓」。在收藏「西泠印社」相關歷史的「文物館」中,有一俞樾(1821-1907)手書「柏堂」二字的橫匾。在重修過的「敬一書院」的建築中,在牆壁兩旁以放大的彩色燈片,介紹了阮元(1764-1849)、俞樾、丁丙(1832-1899)、蘇曼殊(1884-1918)等人的生平與作品。
3. 大家一直想在「孤山」找到和「詒經精舍」相關的東西,但當地人已無人知曉了,杭州人對這些學術教育相關的事情,似乎沒有安徽人那麼關心,這大概就是所謂「城鄉差別」吧!據記載「詒經精舍」原址在孤山陽,關帝廟照膽臺右邊,一九二九年「西湖博覽會」時曾加以整修,盡廢原貌;一九三五年「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不知是否即今浙江美術學院?)改建校舍,已無法辨其原貌了。
4. 下午搭乘港龍航空 KA-621 班機,於三點三〇分離開杭州,約在五點三〇分左右抵達香港;轉搭中華航空 CI-642 班機,於七點二十五分離開香港,約在九點抵達桃園中正機場,回到家已經十一點多了。朱榮貴另搭泰國航空的班機,張壽安下飛機後急著和寶貝女兒見面,所以先行出關,我則因為在杭州六和塔旁購買的裝飾紀念刀,有「匕首」之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以需開箱受檢,因此也先行出關。鍾彩鈞先生則因行李遺失,必須辦理相關手續,但由於張壽安先走而無法得知其行李牌號碼,因此也無法查出彩鈞行李牌的號碼,延誤了一些時間,等彩鈞辦好手續出關後,纔一起離開中正機場。三天後彩鈞的行李纔找到,寄放在他行李內,黃山高專贈送的那一套《戴震全集》,也纔平安的出現,真是阿彌陀佛!這纔鬆了一口氣。

## 感想與心得

1. 安徽學術資源實際上非常豐富，無論「省博」或「省圖」，均有一些別處所無的資料，例如一些地方性作家未刊的手稿或刊刻數量較少的作品，其學術價值固然比不上一般習知的大家，但對一時代或一地域的學術發展的瞭解，還是具有其無可取代的價值；再者這些地方性的作品和祖譜、家譜一樣，每有一些較具地域性或家族性色彩的特殊紀錄，對當時當地某些民間事物的瞭解，也具有非常高的價值；另外像漢墓出土的墓磚畫與徽州建築的三絕，不但具有藝術美感上的價值，並且還具有研究傳統禮制如何在實際生活中運作的實證價值。例如墓磚上的一些「行禮圖」和「生活圖」，就可以用來研究漢人的日常生活、和其所行之禮與《三禮》或漢人著述中所記載的禮制之間的異同等等的問題。又如不同時代和不同身分地位階層者建造的房屋、祠堂、牌坊、擺設等等的差異，也是研究傳統禮制在實際生活中應用情形的最佳實例。如果雙方能夠有一些長期合作的研究計劃，應用這些豐富的資料，加上兩岸學者不同的學術背景、不同的意識型態下，所形成的不同的學術視野，共同來研究，應該會激盪出一些不同的觀點、或挖掘出一些前人未曾注意或深入的研究課題。即以最簡單的手稿、稀少性或未出版的古籍之點校出版而言，對人文學或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絕對有正面的意義。
2. 安徽不少地方還存留有名人的碑刻，這些碑刻不但對研究該題詞者的生平活動、學術影響有幫助；碑刻之文字同時也具有校勘和版本上的價值；甚至對研究交通、經濟活動等的發展也有一定的幫助，因為可以考察這些人用什麼方式前往？花費的時間之多寡？對當地生活的印象如何？另外像張廷玉建在龍眠山頂的墓園，就今日看來，依然是個地方偏遠，交通不便的鄉下，當時如何把那個笨重的棺槨、以及那些巨大的石馬、石翁仲等物從縣城搬運過來？又如何從山下搬運到山上去？其實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因為這些都牽涉到當時的交通、技術、經濟、地方發展等等相關的問題。
3. 由於這一次的考察，纔瞭解傳統嘉獎人們行爲的牌坊，除了肯定「節烈」的「貞節牌坊」，另外還有「忠、孝、義」等三類肯定不同行爲的牌坊。以往由於過分

的「愚蠢」，因此受到「五四激情」成見的影響太深<sup>②</sup>，經常不能平情看待傳統的禮制，不自覺的以負面的角度、以偏概全心態去深求傳統禮制的黑暗面，因此僅注意到所謂「吃人禮教」中把婦女啃的連骨頭也不剩的「貞節牌坊」，並沒有注意到其他三類牌坊存在的事實，透過這次的實地勘查，對傳統禮制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現和作用，有了更多的瞭解。一些以往只是記在書本中的「知識」，經由這次的實地見證，可以變成實實在在的、活生生存在的事物，而不僅僅是口頭上說說談談的「戲論」而已，收穫不可謂不大。

4. 參加座談會的收穫除可以得到不少資料上的訊息外，另一個收穫是可以更清楚的瞭解當地學者研究的方向、方法與成果，對於開闊自己研究的眼界、治學方法的借鏡、研究相關方向成果的吸收運用、現代某些相關書籍作者研究背景的瞭解等等，均有非常大的助益。例如有關徽州「宗族」相關問題的研究（來源、形成、影響、與學術思想的關係等）、宗教思想或活動和民俗的關係或影響、《朱子家禮》在徽州地區的影響情形、徽州地區牌坊特多的原因、徽州儒家思想的特色、徽州儒家思想發達的原因、徽州儒家思想發展的情形、徽州儒家思想與徽商經營理念的關係、徽州學術思想在清代學術的地位價值和影響、徽州學術思想和乾嘉之學的關係等等，這些安徽學者注意到或正在研究、或已有研究成果、或因座談而引發的諸問題，都是以往不曾深入或注意的問題，而是經由雙方的座談討論後，纔加深印象或特別加以注意的問題。
5. 安徽部分學者頗有經費不足、資源不夠之歎，但是又沒有拿出什麼特別有價值的證據，用來證明只要有經費，就能夠做出令人滿意的成果。這種無謂的慨嘆，臺灣也經常聽到，祇是表達的形式不同而已，在我看來，這種慨嘆實在沒有什麼意義。因為想受到肯定而撥出研究經費，除了擬出一套有效的、精細的、具有說服

② 晉龍案：活在「激情」中的人，經常是「盲目」、「盲信」，而毫無主見，卻又自以為非常有主見；完全的被權威控制，卻又自以為是完全的解放者、自由者，因此面對一些所謂「權威」的答案和口號，往往會毫無理智的深信。有些比較具有「理性」的「反省者」，在「激情」過後，經常會發現自己不知為什麼會相信那些答案？也不知為什麼會發出那些附和的言論？活在「激情」過後的人們，應該有能力拋棄那些不該有的「激情」，回復到「平情」的心態，如果不但不能回到「平情」客觀論事的正常態度：「惡而知其是、好而知其非」；竟然還在受那些不必要的「激情」過言之影響，甚至還在「盲信」那些過分「激情」的渾話，不是「愚蠢」？還能是什麼？

力的研究計劃外；更重要的就是先前已經做出的一些有價值的成績，可以用來證明具有執行此一研究計劃、和達到研究計劃所設定的目標之能力，不會白白浪費有限的資源，否則任何形式的慨嘆，不但無法獲得應有的同情，更可能造成反效果，所謂「打了勝戰纔有理由講」，有了成績之後的理由，纔能成爲理由，否則任何理由都有可能被認定爲推託的藉口而已，不足以引人注意。

6. 俗語說：「入鄉問俗」、「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此次到安徽纔深切的感覺到此話的內涵。例如安徽地區用餐的習慣，是先品嚐美酒和菜餚，等到酒酣耳熱，「酒足」之後，纔進入正餐，端出「主食」（米飯或麵食），以達到「飯飽」的最後要求。這和臺灣用餐的先吃飯之後再喝酒的形式，顯然大大的不同；再則喝酒也有一些特別的規矩，吾非貪杯之淵明，故未特別注意。
7. 安徽有一個和臺灣三、四十年前相同的壞習慣：「隨地吐痰」；以及臺灣現在正在改進中而還無法完全根絕的壞習性：「亂丟垃圾」。因爲有「吐痰」的習慣，所以就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在公共場所放置「痰盂」。其實這兩個壞習慣均可以透過教育、宣傳、取締、處罰的方式，慢慢獲得改善。安徽有許多天然和古代遺留下來的旅遊和學術資源，如果好好的加以規劃與宣傳，例如搞好交通建設、舉辦旅遊促銷活動、規劃旅遊路線、或仿製特殊的古物出售（如各類牌坊、古建築、出土器物、徽州三絕等的模型）、黃山之外的其他具有特色的古代遺跡之宣傳（如宏村、棠樾村）等等，相信對安徽經濟發展會有一定的幫助。不過在進行這些需要投入一大筆經費的建設之前，如果能先消除隨地吐痰的惡習、整頓髒亂的現象，將安徽變成一個注重環保、擁有乾淨環境的地區，即使某些建設無法完全達到要求的標準，應該也還有很多值得重視的東西，可以具有吸引各類人潮（宗教信仰者、旅遊愛好者、遺跡探訪者、學術研究者等）的強大魅力。
8. 無論是大陸或臺灣，均有一種「近廟欺神」的現象，就是對自己週遭曾經歷過、或現在擁有的歷史或學術價值的文物或遺跡，不但不知道，也不知加以愛惜，甚至在無意中加以破壞。例如以乾隆時代的墓碑當廚房的殺魚板、棄置在牆角的「雲峰先生遺像石碑」、漢墓出土的小石獸任由風吹雨打、方以智和姚瑩墓地的荒涼、浮山的髒亂等等；又如在杭州西湖孤山居然問不到有關「謁經精舍」的事等。可見愛鄉、知鄉的鄉土教育，的確有加強的必要，如果能編輯一些如「黃山高專」所編的《徽州學概論》一類的普及性和學術性結合的書籍，用以加強對本鄉本土地域歷史價值和地位的認識，激發熱愛鄉土的精神，那麼這些無意

中所出現的破壞性之行爲，應該可以減到最低的程度。

9. 這次的學術交流和遺跡尋訪，如果沒有陳友冰教授的全力協助，事先幫忙安排相關的各项事宜，例如：拜訪座談單位之聯絡、參觀遺跡之選擇、食宿之安排等等，甚至還派他的秘書當先鋒，比我們前一天到達預定參觀訪問的地方，事先安排住宿與參觀、座談等相關事宜，又全程坐車陪同，完全把自己的時間和事情擱下，實在令人感動。幾年來本所邀請的學者專家也不算少，但是能像陳友冰教授這樣，把學術情誼化爲實際行動者，實在非常少見。希望以後能多邀一些像陳教授這般具有「人情」的學者來訪問，一定可以帶給雙方在學術研究上更多的方便和助力。